

#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7期 (交流文稿)

2011年7月5日

##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文革中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刘承才(何蜀)	2
军代表支持我翻“右派”冤案(林定恕)	4
我认识的曾容(它山)	9
回忆重庆二十一中的右派老师们(齐家贞)	15
我的皮鞋成了“政治需要”(陈仁德)	18
“二黄”外调记(雷崇功)	19
一个勘探队员和一个护士的恋情(马万才)	21
倒下的是废墟，站起的是大写的人(黄晓龙)	25
燕京大学的悲剧(倪良山)	32
语焉不详的诡譎(老赵)	36
吴宓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何蜀)	39
旧报重读：1957年重庆整风反右片断(二则)	49

~~~~~  
【关于《巴山夜雨》】友情交流的电子通讯，不定期，不定篇幅。无稿酬，也不收“版面费”。欢迎来这里“聊天”，把你们的往事琐忆、旧闻杂记、亲友追思、人生感悟等等写给我们，也可提供那些字行间回荡着历史风云的故纸残篇，如曾被视为“毒草”的昨日言论，曾被藏进箱底的日记书信，以及影响了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一纸判决书、平反改正通知书等等。

赐稿请发至电子邮箱：[bsyy1957@126.com](mailto:bsyy1957@126.com)

向捐款资助本刊复印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文革中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刘承才

## 何 蜀

蒋介石一生中曾有过许多次险遇。其中，1949年11月底在重庆的一次，差点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和中国政局的走向。而这次未遂事件的策划人，是一个现代史上的无名小卒刘承才。

刘承才当时21岁，是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在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的陪都，他联系上了国民党军警中的一些厌恶当局腐败、盼望变革的人，其中有不愿去台湾的校级军官及空军人员。在1949年11月下旬蒋介石来陪都重庆作最后视察期间，有关人员向刘承才紧急面报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传来的情报：他们已经串联了空军地勤人员一两百人枪，愿意组织起义，控制机场并捉拿蒋介石，但必须有地下党的领导和武装配合。刘承才这时因重庆的戒严宵禁而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也无法调动他一直领导着的市一中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当时市一中已经迁到长江南岸黄葛桠山上，在戒严封渡状态下无法过江）。在紧急情况下，他不得已打通横的关系（本来这是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的），找自己信得过的江北区地下党人设法，江北区地下组织联系了几十人的袍哥枪手，但临到说明是去机场捉蒋介石时，那些摩拳擦掌的袍哥枪手们都傻眼、泄气了，无人敢去。本来刘承才已经通过关系领到几十套空军制服准备给他们换装，满以为即使抓不到蒋介石，把他的座机打个洞也是胜利，但这时不得不宣布放弃这一计划……

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曾面临这一凶险。当然更不会知道刘承才其人。

刘承才，地地道道的“重庆崽儿”、“川耗子”，1928年4月生于重庆下半城一个贫民家庭，约7岁时父母双亡，与姐姐一起寄养于靠救济度日的寡居伯母家。1937年秋，他申请进入专收8至10岁男性孤儿的平儿院，那是一个他至今回忆起来仍充满感激之情的慈善救济机构，新学六年制完小，其教学质量远优于当时的公立、私立小学，还专设有工艺劳作课，在高小的两年里还增设了当时初中才有的英语课。小学毕业时，刘承才靠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市一中（平儿院在市一中设立了两名奖学金名额）。在高中未毕业的1947年他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六一社，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高中学生里的中共领导干部。在市一中（当时设于重庆两路口）学习期间，他常到学校附近的美国新闻处和罗斯福图书馆去看书看报，有关国共内战的许多消息都是从美国新闻处提供的报刊上看到后抄下来向学生们传播的。以后他以银行练习生、英语教师等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学生运动。

1949年底，刘承才和欢欣鼓舞的地下党战友们一起迎了解放军。他结束“地下”状态，先后担任了青年团重庆南岸区（工）委委员、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岸区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年纪轻轻就成了行政十六级干部。

1957年11月，反右派运动深入开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第八次常委扩大会议，按照省委指示，整出一个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于是，整个重庆宣传系统几乎全军覆没，宣传干部们纷纷从最热情宣传中共理论方针政策的吹鼓手一下子沦为“反党右派”、“最凶恶的敌人”。

刘承才自然在劫难逃，于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不仅对他是个晴空霹雳，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都感到震惊，谁也不相信刘承才会“反党”。

刘承才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只给每月16元生活费，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为了表示自己愿意投身最艰苦的劳动来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这是当时各级领导都向右派分子们特别是“党内右派”开出的空头支票），他主动提出到农村小煤矿去“扯水”——在暗无天日的小煤矿下面，用一个原始的竹筒水枪将矿井下的积水一筒一筒地扯上来排出去……当时矿工中有个说法：“宁在阴间做鬼，不在阳间扯水”，可见其劳累之苦重。但刘承才咬着牙干下来了。

1959年末，忠心耿耿的刘承才终于盼到了“摘掉帽子”，次年春调到南岸弹子石供销社商店任副经理。商店经理是个文化不高的老干部，对他十分信任，完全放手让他干，市里开会也让他去。后来

领导上找他谈话，要提拔他，他推辞了，认为自己不适合做商业工作。他愿意当个普通的英语教员。1962年秋，他如愿被调到四十三中学任英语教员。但是平静的日子不长。1964年秋，社教运动开始后不久，社教工作组突然宣布他“右派分子本质不变”，他再次被当成批判对象，交群众监督劳动。次年，他一度被恢复教员工作，但没上几天课又被拉下讲坛。

文革风暴袭来，学校是首先遭殃的地方。在尚不明确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搞的情况下，各级领导都按照反右派运动的经验，准备再次抓右派。重庆各中小学的教师都被按地区集中起来开展“运动”，以大字报互相揭发批判，“人人过关”，刘承才当然又成了挨批的靶子。

然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文革初期的“抓右派”这次竟被毛泽东定了个新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过来抓起了当权派，当年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当权者一个个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打倒了。刘承才觉得自己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希望。尽管一直有“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警告，但他总认为自己不是右派，是被冤枉的。他经常去找同样被打成了右派的地下党时期的老上级赵隆侃分析形势谈想法，他仍然尊赵隆侃为上级领导。

赵隆侃当年是中共重庆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特别支部书记，在1948年那场由于几个领导干部的连锁叛变而使重庆及川东地下党遭受重创的事变中，赵隆侃领导的这个特别支部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中共基层组织。随后，赵隆侃设法与在香港的上海局（原南方局）领导钱瑛取得联系，去香港汇报了重庆的情况，奉钱瑛之命返回重庆，让恢复重建的川东地下党与中共上海局接上了关系，同时将地下外围组织六一社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不久，赵隆侃作为唯一的重庆代表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会后随军南下，50年代初，赵隆侃成为重庆宣传部门的得力干部。反右派运动时，他是九龙坡区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自然成了“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被开除党籍、公职后发配到边远地区“劳动教养”，1962年“摘帽”后才回到重庆，安排在三十中当教员。面对文化大革命波诡云谲的形势，赵隆侃对刘承才说，在他所了解的“右派”中，只有刘承才和公安局的任书旺可以提出申诉要求平反，因为他们二人出身好，根红苗正，没有家庭或社会关系方面的“辫子”，但他叮嘱刘承才，申诉的事，不要找别人串联，在这样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被说成是搞“黑串联”、“右派翻案”。

1967年1月，刘承才向中央文革小组投书申诉，说明自己是被当时的领导人冤枉打成右派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回信寄来了有关政策文件，总的精神是这方面的问题一律留待运动后期处理。不久重庆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刘承才学校所在的地方有个生产子弹的大型兵工企业，成了武斗的重灾区。本来刘承才还坚持留在学校没有离开（虽然学校早已停课），还是军代表劝他们几个教师离开暂避，他才离开了那日夜枪炮声不断的凶险之地。1968年1月，他再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四川省革筹组投书申诉。1968年9月，他又亲自到成都找“新生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上访申诉。省革委办事组的接待人员态度很好，耐心听取了他的申诉后，给他写了一纸便签让他带回，内容是：

重庆市南岸区支左办公室

重庆市四十三中学校：

重庆市四十三中学校教师刘承才于9月9日来我组反映他于1958年被辛加功迫害为右派一事，请你们先调查，按中央政策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并请南岸区支左领导小组指示有关单位调查核实。在未调查落实和市革委有关单位正式作结论前，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不得乱加处理和搞变相武斗。

此致

敬礼！

四川省革委办事组来信来访专用章

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川东北）

1968.9.9

1968年10月，南岸区革命委员会成立。1970年春，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

12月，南岸区革委来人找刘承才谈话，要他撤回上访申诉书。承认错误，这样就不再追究他的“右派翻案”问题。刘承才毅然表示，申诉书早已送交上去，无法撤回，自己要求为右派冤案平反的决心不变。区革委来人说：那就一切后果自负。并要他签字作结。一周后，在一次专场批斗会上宣布了南岸区公检法的“戴帽通知书”，大意是：查刘承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坚持反革命翻案立场，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经区革委批准，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云云。

已经“摘帽”多年的刘承才，盼望“回到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效力，没想到盼来的却是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悲愤，可想而知。

1979年1月，刘承才总算得到“改正”，在区委的复查结论中，只字不提那第二次“戴帽”，似乎把第一次“改正”了，第二次就自然一风吹了。那结论中特别写明：“恢复其党籍（党龄连续计算），安排适当工作，恢复原工资行政十六级，从批准之日起执行。处理降级的工资不补发。”5月，重庆市纪委批准南岸区委这个结论，在文件中没有再用“不补发”这样难听的文字，而换了个说法：“恢复原工资行政十六级（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起计发）”。看来，这就是“改正”与“平反”的不同之处了——因为那些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的领导干部们平反时都补发了被扣的工资。比如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就明确写道：“应予平反……恢复陆定一同志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其受审查期间扣发的工资，分配工作。”如今还有人把右派的“改正”说成是“平反”，实在是大谬不然。

“改正”后，刘承才被调任东方红试剂厂任党支部书记，1981年夏调任刚恢复重建的重庆出版社党支部书记兼副社长。1989年2月离休。

离休后，刘承才开始了如饥似渴的重新学习和思考。他自称为“中共下层，正在寻回自我的迟醒干部”。在重庆的右派老人中，他是较早开始学用电脑的。他用了许多时间重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写了许多笔记，想要从中找到困扰他多年的答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会出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问题？给人民造成如此惨重的灾难？教训何在？……

2001年底，他向中共中央上书，提出希望解决集权弊端，彻底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实现党内民主。

2007年5月，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他与另外三位朋友联名向中共中央上书，提出希望取消“扩大化”的说法，承认这一运动的根本性失误，认错纠错，彻底平反，坦诚补课，还清历史欠债……

2011年“五一”前，患帕金森症多时的刘承才住进了医院。因两手抖得厉害，他再也无法使用电脑或用笔写作了。但他头脑仍很清醒、敏锐，还在不停地思考着，回忆着……■

## 军代表支持我翻“右派”冤案

林定恕

按：林定恕，“反右派”运动中在北碚区委宣传部被打成“右派”，其主要罪名是“反对领导”和“反苏”。文革中发配在嘉陵煤矿劳动。本刊第二期曾发表他的《我被“算老账”打成右派》，现再摘选其回忆录中较有特色的一节，讲文革中“管训队”的军代表支持他翻“右派”冤案的事。在那样左得发疯的年代里，一个领导“管训队”的军代表居然能支持“右派翻案”，除了说明军代表中并非都是“狠抓阶级斗争”的打手（如文中提到的嘉陵煤矿革委会主任）外，还从另一侧面说明当年将林定恕这样的共产党忠诚干部打成“右派”所加的罪名实在是太荒谬了。对这样荒谬的冤

## 案，还始终坚持只叫“改正”不叫“平反”，岂不是也很荒谬吗？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嘉陵煤矿革命委员会成立，军代表任主任。确定六大任务：头等大事当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依次是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拥军爱民、最后还要加上“把革命放在第一位”“狠抓革命”才“猛促生产”。结果是生产管理混乱，事故不断。其中大者有，十月，葫芦坝井二水平南段穿水，淹没巷道和泵房，排水系统瘫痪，靠天府、南桐等矿支援设备、人员抢救半月，才恢复生产；十二月九日，井下电缆由于长期疏于检查维护，接头发生短路，多处燃烧，停产两天。面对事故，不从管理上整改，简单地归结到“敌情”，成天查阶级敌人破坏。

九月下旬，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据《嘉陵煤矿大事记》上说，当时成立了16人组成的“专案组”，排出了清理审查对象61人，其中重点人头19人。然后，在矿革命委员会主导下，掀起了新一轮更残酷的连续批斗。

无疑我是重点人头之一。开初，对我的批斗，除了泛泛地申斥“右派分子想翻天”、“挑动群众斗群众”等之外，问题集中在所谓“蒙蔽群众，阴谋策划组织反动组织”（指1967年8月17日在井下与赵良均等商议组织一个“反武斗”战斗队，反对武斗和乱抓打人的事）和“勾结某些人破坏革命大联合”上。这些都是找个由头编织出来的罪名，许多职工都心里有数，我无所惧。十月中旬，不知道专案组从哪里查到了我为右派问题申诉翻案的事，这下子捞到稻草了，大字报，批斗会，轮番猛攻，说“右派分子妄图翻案，罪恶滔天”，“重庆有个右派翻案集团，林定恕是该集团成员”等等。职工不明真相，“右派翻案”那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呀！台下有人领着不断呼口号，鼓动情绪。这时有一个原武斗队的恶徒跑上台来，二话不说就朝我的左胸上猛击一拳，打得我向后退，痛得几乎晕过去。但主持者视若无睹，不予制止。冷不防，有人竟在我身后又用双掌猛推，把我从一米多高的舞台上推翻到台下，还在地上滚了两转。台下有些群众都吃惊得“啊呀”叫出声来。我感到左胸疼痛，但在这种场合，忍了。

会后我觉得呼吸都引起胸痛，去医务室找外科医师刘德金检查。刘大夫比我年长，是一位医德高尚，为人很正直的专家。他检查诊断为左前第六、七肋骨骨折。他同情又无奈地说：“你知道我们医务室条件简陋，我只能尽力而为。”他用一大幅胶布，围着我的左胸廓，从左前胸一直贴到左后背，相对地固定一下。从医务室出来，我就去找到军代表，说明受伤情形。我说，我相信解放军是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批斗会允许这样打人不对吧？我还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然后指出：“批斗大会是革委会召开的。革委会可不是群众组织，请注意政策。”那军代表强词夺理地说，“那是你不老实，引起群众气愤的结果。”我反问：“那么毛主席的话在这里不适用？”他怔住了，无言以对。

不久，我就被“隔离反省”，要我交待“罪行”。其实所谓“翻案”，就是向组织提出了申诉，何罪之有？我当时判断，可能是报给市革筹组的申诉材料被转了下来，就讲清这件事。后来他们又追问我到北京上访的事，我意识到可能是几个知情者中有人已经交待了，也就干脆说明我上访的情况和中央监委接待站的表态。专案组的老爷们不相信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只是我说的那些问题，申斥我隐瞒罪行，报了假情况，欺骗了中央监委。我说：“这也敢造假的吗？组织上有干部档案，你们去查档案嘛。”最后，他们追问“右派翻案集团”的问题，我说：“翻案只是我个人行为，不知道有什么右派翻案集团。大家都看到的，我在文革中一直没离开工作、劳动岗位。怎么去参加翻案集团活动了？”对此，那些老爷们大为不满，一个劲儿地训斥“不老实！”

十月二十七日，他们要我卷起铺盖、带上所有私人之物，跟一名解放军上西山坪。那年代，要送一个人去劳动教养是当权者一句话的简单事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真的以为要被送去劳教，矿里的职工们都以为我被送到西山坪劳改农场去劳改了。到了西山坪，才知道是把我送到北碚公、检、法军管会办的“管训队”去进行“管训”。

“管训队”设在西山坪劳改农场的一座单独院子里，四周都是农地。院子相当大，里面的平房呈凹字型排列，有十几间房子。队部设在左侧的房子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解放军。其它房子就是被集中

起来的受审查的人们住的了。说老实话，那条件比我在矿里住的工人宿舍还好一点。被管训的有近百人，都是知识分子。除了我们矿的唐庚（原政法干校教师右派）以外，还有几位相识的，如原北碚区的干部唐定中，大新药厂的技术员小李等，都是“右派分子”。其他来自大专院校、中小学和企事业单位的人，我原先不认识。

管训队长许定，瘦高个儿，东北口音，毕业于军事院校，是 8711 部队的一位营教导员，斯斯文文的不像武夫。在第二天召开的大会上，他在宣讲了政策，特别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以后说，把大家集中起来主要是学习，改造思想，交待问题，适当参加劳动。最后宣布分组和各组召集人。出乎意外，我会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召集人。

小组第一次开会时，各人先作自我介绍，我才知道我们小组有几位大知识分子，如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著名画家苏葆桢，是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他画的葡萄水灵灵地有神，闻名于世；四川外语学院教授萧子凤是著名左翼文学家萧三的弟弟，也曾去过法国留学，从事文学研究的；有一位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太太余友才，是西南师范学院教心理学的老师；还有一位从西南革大毕业，在外语学院任政治教员傅军，也被送进来“管训”了。这些先生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批斗，接着又因为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在造反派到处揪叛徒、特务时，被当作“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批斗，然后送来接受审查。我们小组有一位是澄江镇的年轻医生，叫王灿云，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坏分子”。还有一位叫谢正通，是原重庆市轻工局的干部，性格内向，为人很老实的，不知怎么得罪了局长，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到北碚玻璃厂当办事员。他认识我妻子黄梅，而且多次对我说她是好人。

进“管训队”没几天，十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于是布置我们各小组学习《公报》，讨论中谁敢说真话？都一片声地颂扬十二中全会的伟大意义。我倒是认真地琢磨了一下《公报》，发现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个“史无前例”（“史无前例”是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赞美词）：第一个“史无前例”是确定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第二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写明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过去的党章规定过领袖是谁（对此，如果马克思在天上也有知，也会斥之为中世纪的蒙昧作法），但是明定接班人是谁，确实是破天荒；三是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说：“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个在建党初期就“埋藏”进来，在“七大”前为首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在党内成为二把手，后来又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人，竟然是个“罪恶累累”的“叛徒、内奸、工贼”加“走狗”，简直不可思议，也属“史无前例”。

汪周凤（原在区委的同事）的丈夫蓝承聪在嘉陵煤矿供销科工作，把我被送到了西山坪劳改农场的消息告诉梅子（黄梅）。梅子焦虑得不得了，她想到我可能受很大的折磨和痛苦，不知道会被关多久，后果如何，孩子们一辈子背黑锅，……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迫于政治压力，她不能来看我，只能通过蓝承聪来传递信息。老蓝无党无派，在文革中是个逍遥派，无所顾忌，他借口给我送工资、棉衣的名义，到“管训队”来看我。他给我传来梅子的叮嘱：“注意身体，好好活下去……我们母子三人等着你的。只要能活着回来就好！”

但是我当时感到前途难测，不愿再拖累她和孩子。我请他转告梅子：以后的日子说不清楚，为了孩子，为了减轻对她的政治压力，还是离婚为妥。同时请告诉她，我在这里比在矿里还安全，每天早晨做操，上下午学习八小时，中午还睡午觉，晚饭后则是自己支配的时间，除了不能外出，没有什么不自在。要她别担心。我说的不光是宽慰她的话，也确是实情。在“管训队”的开头两个月，就只是要求联系思想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讨论谈体会，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没有要求检查交待问题，更没有叫去谈话或审问。这也可以理解，队部的几位解放军干部先得花时间审阅各单位送来的

一大堆人头材料，还要通过观察每个人在队里的表现，直接熟悉被审查的对象。

只要有时间让我读书，管它行动自由不自由，我就安得下心来。先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好，除了队部指定的文章外，我索性把《毛选》全部重新细读了一遍，联系自己的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反思。继后，于一九六九年初，写了两本笔记，题名《改造集》（一）、（二），约八万字，其中有一部分，约三万余字，立足于自己的人生观的二重性特点，专门“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历程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我是诚心诚意要总结一生的经验教训，探讨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的，所以那笔记主要是解剖自己，而且像鲁迅所言“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也许解放军看到我每天晚上坐在床上写什么东西，起了疑心，有一天晚上，许定来到我床前，说：“该休息了。……你在写什么哪？”我说：“写学习笔记。”他又问：“噢！能给我看看吗？”我说：“可以。”就把《改造集》（一）给了他。过了几天，他把笔记本还给了我，态度和善，只说：“你继续你的学习吧！”我估计，他对我关于“反右”所涉及的那些事实的记述不能不有所保留，是不是我隐瞒或歪曲了真相，他们还需要时间调查嘛。

隆冬，天气整天阴沉沉的，见不到太阳。西山坪上寒风刺骨，比山下显得更冷。梅子托老蓝给我送毛衣来。他悄悄地告诉我，你们一起写申诉的某人在北碚的有线广播上揭发重庆的右派翻案集团，点了一大批“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的名字，其中点到你。另外，还揭发黄梅、罗信群等，说她们帮助“右派”翻案。我“哦”了一声，联想到我在矿里被揪斗的情景，终于明白原来是当年反右时的“起义”者现在又“起义”了。老蓝又说，梅子要到重庆大学集中学习去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集中学习”是什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是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搞清理阶级队伍。梅子被变相地软禁起来了。

有一天，队部通知我说北碚区法院来人有事找我。我进去一看，是老熟人甘政，解放初期在巴县四区工作，一九五一年该区划归北碚后，我们就在工作交往中相识，他与黄梅的关系也很好的。他开门见山地说，黄梅同志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请求。然后拿出一个卷宗里的文书让我过目，大意是：儿子由黄梅抚养，女儿由林定恕负担抚养费……他说，你作为一方当事人有什么意见。本来，我知道这是迫不得已“离婚”，是做给他们单位的当权者看的。但是现在真的要立下文书离婚，万一梅子真的离我而去，带着孩子改嫁他人，我这一辈子活着还有啥意思。我心里阵阵作痛，不禁流下了眼泪。然而扪心自问，这十几年来实在是我连累了她，使她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的和生活的沉重压力，该为她着想。我沉默了一阵，对甘政说，我欠她们太多了，如有来世，下辈子还吧。只有一点要求，请转告黄梅同志把书籍保存好，留给我，让我后半生当个蛀书虫吧。随即挥笔签字同意离婚。

一九六九年春，队部动员我们这些被审查者坦白交待问题，老一套，我也干过——政策攻心。苏葆桢、萧子凤等解放前与国民党官僚、军警、特务有这样那样社会关系的老知识分子思想顾虑很重，解放军干部多次找他们去个别谈话。我的问题无非就是文革中的活动，特别是翻五八年的案，都是明摆着的，没有必要隐讳。我把北碚区委一九五八年三月给我定的“罪”是哪几条，涉及哪些事实，我承认有缺点、错误，但对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不通；我对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委屈情绪，怎样到北京上访，又怎样与当年同案的黄绍群、袁丽娟等联名申诉等，竹筒倒豆子，全盘托出。当然也不能不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自我批判：我有“揭帽右派”的身份，不该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更不该在文革中翻案，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我把检查材料交上去，并向军代表许定坦率地谈了我的思想矛盾：“从青年时代一心向往革命，到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对我来说肯定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违心地给自己加些大帽子做自我批判并不难，难的是真正说服自己。今天检查了翻案不对，过一阵子又会想不通。毕竟客观事实摆在那里，一边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苏修，一边却要我承认反对赫鲁晓夫就是反共；一边是党中央、毛主席旗帜鲜明地批驳了所谓反对本单位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的错误观点，一边却要我承认当年区党代会上对区委领导提了批评意见，乃至向中央组织部写信反映情况都是反党。

我脑子里能不打架吗？怎么从根本上改造我的思想，衷心期望解放军同志给予帮助。”

许定岔开话题反而问我，你们一些人串连在一起搞翻案是怎么回事？我说：“我翻案是个人行为，并没有人策动。至于我与黄绍群、袁丽娟、张邦琇等的关系，只因为是同一个‘反党小集团’案子的，所以联名写了申诉报告，来龙去脉我已写在材料上了。我认为，各人的问题各人自己最清楚，所以我从来没有串连过别人翻案。唐庚、秦涛、梁庭榘虽然都在嘉陵煤矿，但我从未向他们说过我上访申诉的事，也未问过他们是怎样被划为右派的，更未诱导他们翻案。我的这种态度也向黄绍群表明过。原先，我确实不知道有个什么翻案集团，如果有，与我翻案无关。”

他又问：你与郝永吉有什么联系？我说：“郝永吉是我的老上级，被划为‘右派’以后，十来年没见面，去年十月，黄绍群带我去看望他，谈过我上访申诉的事。有点同病相怜。”看来他们是要把我纳入“翻案集团”这大案来审查了。要我写补充交待。我还是老信条，批判可以从严，不符事实的事决不认账。听候慢慢查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真得感谢当时审查我的军代表们，让我留下了那些“检查交待”的底稿。要不然，事隔三十余年，难免往事如烟，朦胧不清，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就不可能连具体情节都记述得那么确切了。

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已经面临崩溃，有目共睹，但是报纸上还在闭着眼睛瞎吹形势大好。四月一日，在铺天盖地的红旗招展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特点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狂热的个人崇拜和背离社会现实的所谓阶级斗争理论。在组织上，林彪、江青及其亲信的势力极度膨胀。在那段时期，干部、师生、职工、农民，普遍戴毛主席像章，到处跳“忠字舞”，每天早晚手举《毛主席语录》搞“早请示”“晚汇报”，就像天主教徒向上帝祈祷一样。真可悲！主张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竟转向了宗教唯心主义！在管训队的某小组里，不知是哪个奴才别出心裁，想争表现，也举起小红书，搞什么“早请罪”，“晚忏悔”。我听见就恶心。我们小组有人问我是不是也搞起来，我说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队部并没有布置，不搞，多用点时间踏踏实实学习为好。我鼓动大家利用被“闭门思过”的难得机会，多看点书。我自己则埋头读马列。我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写的《学习笔记（一）》的《前言》上写道：“我自1969年4月起至5月25日又重新学习了《马恩文选（两卷集）》中的全部马、恩的光辉著作，其中重点著作反复研读了三、四遍，现在打算主要从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进一步加深领会，作些笔记。”就这样，我把这变相的牢房当作了我的书房。被关一年，读了不少书，用蝇头小字写了11本（近50万字）笔记。回顾当年，我并无遗憾，岁月没有虚度！

炎夏，太阳火辣辣的。这年开春以来就雨水少，田土龟裂，又是一个干旱年。那天，解放军领着我们去农场抗旱。下午回来，许定找我谈话，态度友善，说：“我们经过初步调查，也看了你的档案，你交待的情况基本属实。看来你的问题有可能考虑甄别。请你写一份你在五七年受批判的各方面问题有关的具体事实和经过情形的详细回忆材料，必须客观、真实，不必加批判认识，只作为我们进一步调查之参考。另外，请你写一个名单，列出清楚案子情况的当年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干部，以及他们现在何处。尽快写好交给我。请注意，在未做结论之前，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

听了这一番话，我内心很激动，主要不是因为旧案甄别有望，而是因为我直接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许定与我素昧平生，在管训队这种特殊环境里以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身份相遇，能如此客观、公道、认真地办案，太不容易了。特别是在当时“左”得出奇的政治背景下，要甄别所谓“反右”铁案，显然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没有无私无畏的精神，就不可能这样敢于冒风险，敢于实事求是。我对许定同志肃然起敬。

我把写好的材料和名单交给队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下文。我知道调查费力费时，而且被审查对象是不可以打听调查情况的，这是纪律。所以我当作没那回事，照常规规矩矩地参加管训队的学习、劳动。



有一天，奇远背着一个竹背篋到西山坪来看我，给我送来了一捆书籍和一些日用品。这才知道两个孩子已经从北京回重庆了。面对孩子，我阵阵心酸。

“妈妈好吗？”我问。

“她们的学习班结束了，妈妈已经回家。”

“妈妈去接你们回来的吗？”

“不是。因为学校要复课，妈妈走不开，托表叔张天元顺便把我们带回重庆的……”

“回去告诉妈妈，爸爸身体很好，解放军对我也很好，不要担心。妈妈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你们两个娃娃，太辛苦了。你们一定要听话。”

简短地说了一会儿话，奇远就告别了。我呆呆地站在院坝前，一双含着泪花的眼睛直望着他的背影由近而远。

秋风送爽，雁南归了，我们被禁锢在这山上还不知道何时了结。但看得出来，队部的解放军成天在办公室里写东西，非常忙碌，清理阶级队伍已经进入结案阶段。布置给我们的学习时间减少了，而去田间劳动的任务加重了。

一天早晨，全队集合，许定讲话，针对不少人盼望早做结论早回家的情绪做思想工作，强调前段时间主要是学习、交待问题，劳动比较少，现在要补上劳动这一课。改造得好不好，还要看劳动表现。最后点名叫我出列，宣布从今天起由林定恕担任领队，按队部的要求组织学习和劳动，诸位能否自觉地管理好自己，这是个考验。希望大家好自为之。自此，我开始带领一百多人学习、劳动，让队部的同志集中精力搞结案工作，直至我离开管训队。

有一次，去队部报告劳动情况，许定告诉我，他们去找到了我当年的领导和一道工作的同志，都认为“林定恕就是太骄傲，太自以为是，锋芒毕露”。他还说：“张种玉同志是很关心你的，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刘副书记也觉得当年对你处理得过重了。这些老同志很实事求是的，你应该感谢他们。”

国庆节以后，陆续有一些人被宣布解脱，送回原单位，其中有我们小组的谢正通。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黄梅。后来梅子告诉我，老谢不仅把信及时送达，还详细地说了我在管训队的情况，使她在揪心的记挂中得到了一丝安慰。

到十一月中旬，队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我的案子仍然结不了。许定找我正式谈话说，甄别报告经上级党委研究认为当前不宜处理这个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再说。我内心感到有点遗憾，但是仍然衷心地感激他。他要我再详细地就一九五六年北碚区党代表大会中的问题和反对赫鲁晓夫的议论问题的经过情况写一份材料。我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写好交给了他。

十一月二十日，队部通知我，结束“管训”，回矿工作。

别了！我尊敬的许定同志！

别了，在“左”倾恐怖时期还有一点求真闪光的管训队！

我自由啦！

自由啦？别高兴得早了！回矿，等待我的还是炼狱！

告别许定同志以后一直不知道他的去向。听说他政治上不受信任，转业回老家了。……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从历史的漩涡中过来》，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我认识的曾容

### 它山

(1)

年轻时，我喜欢看话剧。

上世纪50年代初，重庆的话剧颇负盛名。市文工团演出的话剧，对我这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较之40年代看的话剧，无论舞台布景、灯光音响还是服装道具，都有改天换地

今非昔比的崭新感觉。犹如刚刚改革开放见识到国外的宽银幕大片那样令人震撼与兴奋。

每当周末华灯初上，人们匆匆忙忙赶去观音岩，拐进纯阳洞小街，从两边鳞次栉比的低矮瓦房店铺之间，沿着断断续续的石梯坎拾级而上。甫近尽头处右手即是剧场的外大门。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将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二摄影棚改建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名的“抗建堂”。随即有中国万岁剧团在此首演《国贼汪精卫》，从此各个戏剧社团到该剧场演出过 30 多种著名话剧。这里是当时文化艺术界的重要活动场所。据说，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也在这里演出过。山城易帜后，更名为红旗剧场，专属市文工团（58 年改为市话剧团）。

从看《四十年的愿望》、《俄罗斯问题》、《种橘的人们》到《雷雨》、《日出》等，我都是忠实的观众。台上的角色个个精彩，性格鲜明。引人入胜的剧情、人物命运，使人感动，为之唏嘘，为之流泪，为之激奋……其中印象尤深的，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天真活泼，可爱又调皮的冬妮娅，《绞刑架下的报告》里优雅机趣的女招待，《雷雨》里追求爱与命运苦斗的繁漪，以及《日出》里忍辱负重，保护弱者，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翠喜。

《日出》剧中的主角是陈白露，而翠喜。我认为是另一个主角。她貌似粗俗，内心非常善良，竭力护着走投无路的小东西。能把在应对社会邪恶时的打情骂俏，插科打诨的表演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于任何表演者都应是挑战，演得好陈白露的并不一定演得出活灵活现的翠喜。据说，曹禺在首演《日出》时，就曾到后台对扮演翠喜成功的演员表示祝贺与致敬。

当年，看戏的人没有当今粉丝们的追星热情，对谁演啥角色喜欢刨根问底。把戏看多了，才知道我印象很深的几个不同的角色，都是一个人扮演的。她的名字叫曾容。

不同的戏里，不同的性格，风采各异，竟然是一个人所扮。顿然使我感到艺术的高深莫测与无限魅力，甚至觉得演员职业有着天生的望尘莫及的神秘感，令我惊叹、崇敬、佩服不已。

每次看完戏，人们喜欢在纯阳洞和观音岩交汇处，路边摊上吃面。我也总要挤进去喊上一碗“鸳鸯”，其实就是一半面一半抄手的小面。没想到直杠杠的重庆人，能取出这样情意款款，生死相伴的名字。回眸一瞥，好些市领导官员也在此饥不择摊与民同乐，吃上一碗才各自徒步回家。

一块大门板铺的摊子周围，站的站，坐的坐，热气腾腾。有几个小年轻的，边吃边议当晚的演出。有人说到曾容，自称亲自看见过。说她黑不溜秋的，长得并不咋样，不像在台上那么漂亮。立即遭到同伴们的强烈反对，说他吹牛不打稿子，她怎会不漂亮？

其实，我也未曾亲识庐山真面目，却从心里认为这家伙扯谎，造谣。很想上去纠正这个轻狂的小崽儿，但无凭又无据，当然我未敢冒失。只觉得心中窝火，抹干净嘴巴，独自悻悻然回家去了。

## (2)

1957 年那场政治风暴把许多人打成了右派。其中有我，而且是单位上态度愚顽恶劣，最年轻的一个。

遣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历经摸爬滚打一年有余。市里再把文化系统下放干部和受监督改造的分子，通通集中到一个山区里修公路。

那年冬天很冷，山沟里狭窄的一片天似乎也冻僵了。一张欲哭无泪的脸，冷漠地天天望着我们前前后后走向工地。

赶在我前面的两个女同胞，显眼突出。后面的喊：“曾姐，等等我！”前头的催：“快点小邱，今天要争上定额！”

曾姐一副严实装束。左臂腕夹个草蒲团，右手拎着小榔头；再生布围腰从胸前拖到膝盖下，黄桑桑的油布包扎着裤腿，头上包羊肚子毛巾，可谓武装到顶了。

小邱个子小，手小脚小脸也小。五官眉目恰当和谐地组合在一起，横跨一副金丝小眼镜，文静清秀。袖珍型身段照样包裹得十分紧凑，锦缎小棉袄中式高领，透出几分考究与高雅。

面对这一前一后貌似赶去垃圾场拾荒的两个女人，谁能想象——前者是我仰慕已久的曾容，后者

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还在重庆时的钢琴师，新中国初期极为稀缺的钢琴艺术人才邱令贻。

马思聪到重庆演出，急需熟悉五线谱的协助伴奏者翻乐谱。找到会弹钢琴的却不识五线谱（那时多有识简谱按风琴而涉猎钢琴的非科班出身的音乐人）。后来找到小邱解决了问题，并担负起不与外人言传的特殊任务：她翻谱时，有一只手垂于身后。小手一摆动，坐第一排全神贯注盯着动静的组织者，立马率先鼓掌，带动全场观众跟着鼓起掌来。

此后，凡有外国演出团体来渝，尤其是有难于领会的音乐节目，比如巴赫、莫札特、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等，令人发懵的名目和什么调呀奏的，就非她莫属。一只小手指挥着人民大礼堂里数千观众，不失时机地爆发出礼貌热情、似乎都听懂了的雷鸣般掌声。

我这时才真实地看见了曾容，桃尖型脸庞确实有些黑。我们木然相视，各自匆忙地走向工地。

纯属偶然，我当上了无证无照的施工员。区里派出的技术员要管相隔甚远的几处工地，挑了我这个曾在部队学习过几天参谋，略知一点施工的人替他放线收方。使我成为被驱赶羊群中逃逸出来有须臾自由的一只羊。

我干得如履薄冰。经常应对下放干部居高临下的刁难，还有个别“同犯”的误解。其实我收方正如农民弟兄说的是跑马丈山，用工程标杆每格 20 公分为刻度，超出一点即以 10 至 20 公分增加计，只会多不会少的。但是，总有人嫌量少了。

只有我心中暗自敬佩的曾姐，却说给她量多了。

收工前半小时开始收方，收到她和小邱面前。我急于收完回去打饭（迟到常常没有菜）。拿标杆横顺一卡，再竖起量个高度。这高度是收方的关键，长、宽大数相乘的面积，再乘上最小数的高。宽严在此一举，只要增高一点，其立方的数便增大不少。为了让上下都满意，我一律抛着量高度。谁能歪起脑壳看得准手卡标杆处与地上碎石堆顶面的平行高度呢？即或检查起来也容易说得脱走得脱。但是，这天我实在太抛了，又懒得弯下腰去平视一下确实接近的高度，就按 60 公分高计算。显然比她头天捶的碎石超过一倍多。

我想，多了还不好吗？非要我重新量，再量的结果确实仅有 0.35 方。

我回到队里，饭冷了，菜也没了。打二两包谷沙沙，这是包谷芯子混在一起打成的粗粉子。实难下咽，端到一座石磨盘边上去慢慢克服。正在口干舌燥吞咽近于锯木屑的晚饭，就着一碗冷开水帮助冲填饥肠辘辘的肚皮之时，有人丢到我饭碗里剥了皮的两瓣大蒜。

只见曾姐的背影消失在旁边厢房女生宿舍里去了。咬一口大蒜满口唾液，让我顺畅地完成了这一顿晚餐。

后来，我问小邱。曾姐哪个那样固执认真呢？多就多了，反正队长对立方没有概念，他还以为一市尺见方就是一方呐。

“哎，你忘了？那天我们看到你挨那矮个子下放干部的训。”她推推眼镜：“别人说你偏袒右派，是阶级报复。曾姐担心你！”

“那又何必跟我认真呢？”

“她不认真，你不认真，我们都不会落到这里来。”

一句话，使我木然凝视远方。苍山无限，云雾茫茫。

在这里，交谈当右派的来龙去脉是犯禁的。尽管无明文规定，但有前车之鉴。有人摆谈自己当右派的经过，被汇报上去了。在学习会上认定为不认罪，意欲翻案的表现。作检查，挨批判一个多月。我俩欲言又止。

但是，我越发想对她俩知道得更多，更多。

利用收方，跟人套几句闲话。从剧团当右派下来的不少，有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的难友，在《日出》里扮演黑三的赵平也在其中。不能一次畅谈，只能一边收方一边零敲碎打地探问。以我漫不经心地给他量抛点，表示友好。还真灵，我知道了很多。

曾容是外婆养大的孤儿，8岁当童养媳。日本鬼子打到长沙时，她只身逃到武汉，为难童院收留。后来到了重庆歌乐山，孩子剧团选中她去当小演员。

一个几乎是文盲的孩子，经刻苦学习钻研，还进入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深造。40年代演过不少话剧，小有名气。到市文工团里，也算是个台柱子。生活中的她平淡朴素，人生得有些黑。但她一上台便光彩照人。是一个难得的颇具天赋潜质的演员。

她自信倔强的性格，并不外露在待人接物上，却对表演艺术十分敬业。对自己认真，对别人也认真。57年她认真地“帮助党整风”，建议按业务选用主角，不一定必须是党员嘛。这可惹下了祸。

小邱是医生的独生女，3岁开始由父母抱上琴凳学习钢琴。平日衣着讲究，显得有些鹤立鸡群的傲气。领导上给与介绍对象，她居然拒绝，还说不可思议。这些传闻，问及她本人总是嫣然一笑，讳莫如深。

此外，另有一说。曾容是受到早已离婚的丈夫，著名戏剧评论家王大虎极右分子的株连，王的父亲又是“军阀”王缙绪。与生俱来的原罪，在劫难逃。

有的还讲，她俩是因时称“西南王”的一把手认定知识分子（其实论学历文凭她俩算不上斤两够秤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必须在钦定比例之上再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指示下被“补划”的。因此比大队人马遣送农村稍晚一些。

那天，她俩也是一前一后背起行李卷，小心翼翼走在刚刚铲过的冬水田田埂上。没有搭泥的田埂只有10来公分宽，窄得跟铁轨差不多。她俩像扭秧歌一般，两只手左抓右挥保持平衡，先后栽进了冬水田。呼呀喊的，相互牵扶着费力地爬上了田坎，泪水泥水混流在一起。劳动改造，给了她俩第一次狼狈不堪的神圣洗礼。

正在坡上做活路的社员们，尤其是妇女儿童笑得前仰后合。队长吼了一声：有啥笑的？可怜巴沙的。

### (3)

一月前，当兵出身的队长说中央有精神，要给改造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动员我们在改造中要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在劳动火线的严格考验中争取当第一批摘帽候选人，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党，欢迎你们！

他立即下达指标定额：男右每天捶碎石两方，照顾女右只捶一方。

这个消息犹如严冬里的一声春雷乍响，似乎要提早唤醒一切蛰伏冬眠的灵魂。

我们似若在苦海无涯之中，忽见佛光漫射的彼岸。这位文化不高，颇为可爱的队长在岸上抛下一具红白相间的救生圈，叫人顿感绝处逢生的喜悦与激动。谁不奋勇当先，作一次拼死拼活的冲刺呢。

只是，山区里经亿万年洗炼冲刷出的嶙峋怪石，当地农民叫做“油炉石”。坚硬超常，凭手锤敲打完成这个定额，决非易事。

而一立方是啥概念？相当于一张旧式八仙桌的长、宽、高各加20公分的堆头。其总重近于三立方泥土的重量四、五吨左右。

几天之后，无人达到指标。大家开始着急，想办法，找窍门。搜集易打易碎的石块，何时何地见到一块，都会喜形于色捡到工地来。有的给片石灌水，撒石灰。似乎石头是泡得软沤得烂的东西。

打出碎石最多的是曾容，每天都在0.3至0.4左右。石子是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体力再棒的男右也只会有一双手，在同样时间内只能多打出0.1至0.2罢了。距1.5方差得远哩。

我如实向队长报告，定额实在太高。他立即给我一顿训斥：“你想得安逸，定低点。你也可以摘帽了？”

他退后一步，沉默片刻，猛然摘下脏兮兮的旧军帽往桌上重重一摔。

“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一天等于二十年，热火朝天向着共产主义迈进。你要泼冷水，想拉革命的后腿，是严重的右倾。不，是跟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一样，痴心妄想！”他把背熟了的报刊社论语

言，跟一挺机枪似的对着我一阵狂扫。

是的，各大报上天天一遍红，高产捷报频传。不是“卫星”上天，便是“鸡毛”飞上了天等等，连篇累牍的新闻消息，通栏大标题的“人有好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宁可少活廿年”，也要把什么什么拿下的特写报导。铺天盖地，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滚滚而来。以至队长要号召右派分子到劳动火线上去建功夺勋争当摘帽候选人。

然后，他像在一场战斗刚刚结束后，对倒下的一遍横呈的尸体再逐一补火那样，对准我大声吼叫：“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

山光西落。敲击片石的锤起锤落中，透露出疲惫的稀疏。也许是我挨队长这次痛骂，心情跟天色一样暗淡下来了。恍惚间，工地上是一群影影绰绰的幽灵，疲惫不堪地在走动，有气无力地敲打着石头。我该去收方了。

这时，曾姐与小邱同时抓住一块薄薄的片石，都往自己一边拽，拉锯起来不亦乐乎。我正要起身前去，她俩又同时松手，各自倒在一旁的草地上。她俩如梦初醒，又迫不及待地胜似生死诀别一般，手膝着地爬向对方。相互紧紧抱头痛哭，哭得伤心，叫人心颤。

“曾姐，我好昏啊……跟你争啥？”

曾容给自己的脑门上重重一拳，泪眼模糊。“……格莫斯，我格浑……丫……”突然冒出的湖北话，把大家逗笑了。

一块片石的厚薄软硬几乎成了人人争夺的救生圈。可是，老天爷没有那么仁爱慈祥，不能从天而降许多轻易打得烂的片石来，或如童话里的仙人一指，便有一堆堆现存的碎石，以满足世间可怜的待罪之人争抢生存自由，赎身脱罪的渴求。

难友们都在为队长的高指标定额努力奋斗。在我看来那是一座人力无法达到的空中楼阁，何况每人每月只有 19 斤毛粮的供给。

眼看我崇敬的曾姐，扭曲着身子挑起一担片石，歪歪倒倒，迈着内外八字步在坑坑洼洼的工地上，坚忍不拔地挣扎。哪还有舞台上女招待的轻盈，繁漪的风姿，翠喜的机灵？

她总是像爱护自己的亲妹妹那样照顾小邱。从不让小邱去捡片石，都是她承担提供原材料的任务，常常还要撂下担子冲向小邱，抓住她抽筋（俗称“鸡爪疯”）的手帮着扯手腕，揉肩臂。好一阵平静下来，赶忙又喂小邱一口冷冰冰的白开水。小邱把家里刚刚邮寄来放在裤兜里的水果糖，剥去糖纸塞到曾姐的嘴边。曾姐不要又急得她快哭了。

几天来小邱的手抽筋越发越勤，榔头换到哪只手哪只就抽，气得小邱珠泪簌簌。当年指点观众热烈鼓掌的手，这辈子恐怕只能翻翻乐谱了。

苦战一月来，她俩已是伤痕累累。手上的冻疮、伤疤纠结一起，缠上纱布又载不上手套，用一双包扎着手继续劳作。衣着磨损，尘土满面，像一对失魂落魄的伤兵。

赵平是抡大锤开片石的大汉，也发善心，有时拣出些小碎块片石提过来送给她俩。戏里的黑三凶神恶煞，楼上楼下寻找要捉回去交差与金八爷的小东西，在这里却表现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爱与同情。

在这山川沉寂的广阔天地里，男右们可以到处拉屎洒尿。女右们则颇为不便，常常东躲西藏找一个避人耳目的场地去方便。

这天，小邱去了将近一个小时。曾姐发觉心里很是不安，又想起她这几天心神不定，情绪低落，立即四处寻觅，不断地呼喊小邱。山谷中响起长长短短凄厉颤抖的回声，引起了男右们也紧张，跟着嚎叫不已。乱七八糟的呼喊声终于唤起山坡下一声轻微模糊的回响。

曾姐急忙追下坡去，东拐西绕到一丛刺巴林里找到小邱，只见她退缩在岩腔之下。一条瘦骨嶙峋的大黑狗在她的前面，呲牙咧嘴地不嚎不叫等待着什么。曾姐拣泥块赶狗，但是那家伙实在饿得不肯离去。它在等候一顿难得的人造美餐哩。最后是在曾姐又撵又唬，兼当守卫的情况下，小邱才完成了

一次方便。

曾姐把脚踝崴了，一拐一拐地扶着面如土色的小邱慢慢爬上坡来。曾姐不顾自己的脚，长长地叹出一口气：“生怕你……唉……我的心子直跳！”

“哦，不，不会。说那是叫做‘自绝于人民’。只是我一天才打出这么一点点，没有望头了，拖到哪天算哪天罢。”

“小邱——决不！要坚持。”

从此，她俩更是形影不离，即使大小方便都会一起行动。偶尔，还听见曾姐谈起自己当童养媳后，跨过一道道坎的往事，说自己咬紧牙关，不总是都过来了吗？

不得不让我想起《日出》里的翠喜竭力保护小东西的剧情。难道说，偏心的老天爷总是安排你扮演翠喜这个悲天悯人的角色吗？

#### (4)

一天晚上，队长宣布明天大决战，要确定哪些是摘帽候选人，叫炊事班把中饭送到工地上。要准备烧篝火，夜战通宵，不达到预期的定额决不收兵。这样破釜沉舟的安排，尽管令人吃惊，为了摘掉右派帽子，无不驯服地忍受一切安排。

第二天，拂晓的霜风透骨。人们提着自备的小马灯，满坡遍野，前前后后的灯火各自踽踽前行。没有迟疑，没有怨声。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脚下的白头霜吱吱作响，提醒着这不是梦。

曾姐与小邱早已到场，摆开架势跟石头较劲，锤起锤落在微弱灯光里闪动。蓑衣、斗笠，还有一张大油布摺在积霜如雪的片石堆上。两口大漱口缸里剩些冷冰冰的萝卜樱拌红苕粉的羹羹，有意留着，以备饿时喝一口。她俩一天比一天来得更早，捶石子更加熟练，更顽强。只是脸上更显菜色、沉郁。

晌午，队长亲领炊事班送饭到工地。队长称之为保证战斗，要吃好吃饱的中饭，是炊事班煞费苦心弄出来的。包谷连芯子磨出的粗粉拌收头牛皮菜叶子、萝卜樱、老盐菜的混合物，扑上苕粉费劲地团拢一砣的东西，一人一砣，外搭一瓢鹅儿肠之类的野蔬清汤。一盆炒盐，任人取用。炒盐兑水是当年应付饥饿的一大发明，炒盐一抢而光。

队长重申大战的决心，还补充了三条：

一、下放的没有“摘帽任务”，6点可回驻地吃饭，晚上余书记领着学习中央文件；其余的，决战之后，再说。

二、炊事班6点前补齐20挑柴火，沿工地堆放，听候命令点火。

第三条是叫我随时收方，发现达到定额的立即报告，不得延误。

当然，我是决不会延误报告的。夜间的山风如刀，看来看去，四处寻找，男右1.5方，凭肉眼看都差得远，只有曾容有希望，小邱也不错有0.4的样子。不过其中有我放水的成份，今天可不敢放多了，担心队长要检查验收。

山谷中夜幕降临，篝火点燃了，雄雄火光映照着半边夜空。

我心里着急，悄悄跟小邱建议。把她的石子归给曾姐如何？小眼睛眨巴眨巴，她摘下小眼镜，高兴地同意了。反正自己没望头，如果问她的石子呢，只说手抽筋，捶了一点点。

但是曾容断然拒绝，坚决反对。她要打出实实在在的定额，还要帮小邱打出一立方，要她俩都一齐当上摘帽候选人。她那倔强的眼神，仿若又见翠喜，我无话可说。

我不顾曾容的反对，估计应该有增长的情况下，忍不住向队长报告：曾容达到定额了。

队长不说话，看着从山坡下爬上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公社文书，拿着封信，问余书记在哪？队长往后努嘴示意在队部。队长顺手抓过信，抽出未封口的信。看毕，丢给了文书。

山风一阵紧似一阵，打了个冷颤。我再次报告：“曾容达到了定额！”

“嗯？”心不在焉，凝视夜空。

“队长，去不去量一下？”

“量个球，撤！”

哨音响起，人们却发出阵阵疑问、惋惜、失望，以及哈欠声声。

我要去跟曾容说，估计她已达到定额，祝贺她将是第一个摘帽候选人。

火光中，只见小邱抱住披头散发的曾姐，两双眼睛的泪流在一起。曾容坐的草蒲团血迹斑斑，殷红一遍。血水顺着边沿往下滴，流到乱石枯草间，悄然无声。

第二天，我们知道了队长突然叫停止夜战的原因。

一个多月前，队长上区里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要求对彭老总的“万言书”表态时，他不知就里，举手赞同，当即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心情沉重，回来便安排高定额，搞火线摘帽。昨天本想请公社书记来视察他组织指挥下的大决战。创出高定额成绩给领导一个惊喜，以佐证他决不右倾。

但是书记不来，只派文书送达区里的正式处分他的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党籍，就地监督劳动，接受批判。

小邱对我说，自从听了队长的动员，曾姐就在拼命。早已发觉情况不正常，坚持不请假，不看病，直到大出血。幸好队上兼职的难友医生，及时给打了大剂量的止血针。

春天，确实宣布了几个人摘帽，但没有曾容。她很失望，很伤心。我搜索枯肠，想起了一句什么戏里的台词，聊以宽慰她和我自己：“鸡叫有早迟，天还是会一齐亮的。”

“你——年轻！我可等不起啦……”她转身而去。

(5)

不久转移场地。尽管还是在一个农场里劳动改造，但我们没有见过面。直至1961年冬天，把右派集中在湖湾深处的一个岛子上。我们又见面了，她已经摘帽。手里常拿着一本皱皱巴巴惨不忍睹的剧本，不时在看。

不久，她调回市话剧团。背起一个稀眼大背篋，神色仓促又高兴地登上双飞燕（双桨一人划的小舢板），频频挥手告别大家。

听说，她重新走上了舞台，演《雷雨》中的繁漪B角，我为她高兴。到文化大革命，听说她参加了什么造反派，正在力争要求单位上按政策公正对待摘了帽的右派，还要决心做一个钢杆革命群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云云。我为之怵然，我的曾姐呀，你还在执迷不悟啊！

再后来，听说她遭到造反派的毒打，被押到解放碑挂黑牌子公开批斗。病倒后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还在坚持读剧本，做着重上舞台的梦。但是没有等到1978年的“改正”，罹患怪异的下身癌变之疾，未及不惑而英年早逝。小邱等到了天亮，终生未婚，患乳腺癌而去。

2009.10. 中秋■

## 回忆重庆二十一中的右派老师们

### 齐家贞

五七年，我在重庆市第一中学读高一（下），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大转折年。之前，他们老说我“只专不红”，真的太抬举我，“不红”是事实，“只专”完全名不副实。

我的“只专不红”几乎与反右运动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专”越深入。所以，学校放映什么反右纪录片，林希翎穿着退了色的军装，在台上慷慨陈词，章伯钧给愤怒的群众吐了口水，狼狈躲进屋里，语文课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强调学生要认真阅读，我根本没有其他同学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要不是后来听说我读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这场扼住知识分子咽喉、打断知识分子脊梁的反右运动，真的是掠我而过了。

令我震惊的是，当右派的全是我们最敬爱的最优秀的老师。

二十一中是新办的初级中学，从四面八方调来了不少全市最优秀的教师。

老师好是学生的幸福，但这一次，对老师而言，恰恰是大难临头。因为，二十一中是重庆教育系统反右的重灾区。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校长王增庆。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说话很斯文，冬天经常穿一件黑呢长大衣，脸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学说他参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党员干部，他教我们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长得漂亮穿得很阔气，在二十九中教俄语。那时我觉得这对夫妻好像有问题，出身“资产阶级”。

和王校长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还有几何老师易冠九、历史老师张理、地理老师吴启承、音乐老师阮永昭。我只知道教过我的老师，其他班也有老师成了右派，详情我不清楚。

个子高大的历史老师张理，上课时声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开小差，下课后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极其流利规范的板书，很不舍得擦掉。五七年初，我们结伴回校，张老师看着长高了的我们说，嗨，我怎么长矮啦？打成右派后不久，张理被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里面，具体原因不详。我后来也是进的这个看守所。

音乐老师阮永昭，一位积极上进的共青团员，她五二年被提名选拔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因为几粒有点发灰的假门牙影响面容而落选——想不到无产阶级也吹毛求疵讲漂亮。五七年她当了右派，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离婚，带走了两个只有两岁的女儿。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师在街上一个大碰头，她还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老，或者，她年龄不见得比我大多少。我从不懂世事的初中生，变成坐过十年牢还在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这次突然的会见，两人都有点茫然，不知话从何讲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也没多聊几句。阮老师问，齐家贞，你还唱歌吗？我答，很少了。我曾经是阮老师最喜爱的学生，每学期音乐考试，她都给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独唱或是歌舞剧，她总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舞。

吴启承教我们地理，没几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他当过一期我们的班主任。年轻潇洒，仪表堂堂，有点刚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给陈为君老师，什么父母政治面貌、解放前后接受过何种惩处等等。吴启承也凑过脸来看表。他说，哈，你的爸爸是齐尊周？我们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学）的同学，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装）起这么积极。我当时对他这句侮辱我父亲的话，心里很不满。他嘴巴有点打人，当右派大约由此而来。

我最想说的是易冠九老师。

我们初中二班进二十一中第一学期，就创造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几何考试全班五十四名学生，没有一个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学校把宓广斌老师换下来，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来教我们时已经超过六十岁，那是五四年初，张理是他的女婿，孙儿孙女都有了。易老师一口湖北腔，宽皮大脸，剃光头，穿中式长袍、布鞋，讲课时元气十足。相信他演过京剧，课堂上经常有舞台动作、舞袖闪腿等，他挥舞直尺像在挥舞马鞭。

从易冠九第一堂课开始，我们这个班所有的调皮蛋，包括本人在内，全部收服。不光是因为他凶——他是有点很特别的威风，而是他精彩的讲课和难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师似乎不费力就把一个如此糟糕、对几何完全丧失兴趣的差班提了起来。

我矮小，坐第一排，经常得非常专心地看着他，不然，他的“马鞭”就可能从头顶上挥舞过去，吓我一大跳。我还不得不一改回家从不复习的懒病，起码是几何，第二节课我才不至于开黄腔，我已经因为开黄腔被易老师取了一个外号，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师问，三角形全等定理，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我长声吼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没——有——！没有？你站起来！是不是没有？我看到他的脸很严肃，想起讲过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点点）”。从此，易老师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毕业离校，他未必记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师匠心独运，他把极其枯燥的几何，魔术般地变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几何定理、证题步骤等教学内容放进歌谣、顺口溜里，使我们容易记。比如，他讲用等量代换（甲等于乙，乙等于丙，甲就等于丙）定理证题时，他唱，“这一代，真可爱，把要证的事儿代出来……”上课时有人放屁，大家会乘机放肆地笑，易老师就唱，“笑人屁，莫志气！”笑声马上就忍住了。搞惯了易老师的唱，有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自觉地唱出了几何定理。

从此，我们盼着上几何课，大家屏气凝神一节课，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出戏，戏没看够，课已经上完，老师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已经刻进脑子里。二班的几何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连那个发育过分、有人说外面有男朋友的张姓女生，也得过一次六十一分，我后来对数学一直兴趣浓厚成绩很好，就从那时开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气，正直的人讲真话，这就是他为什么当了右派。听说，他给开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农村。记得他的太太在家没上班，生活靠易老师。一介书生，年纪离七十不远，到农村种地能拿几个工分？接着是“自然灾害”，种田的人没粮食吃。我猜想，易老师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闯过这场席卷全国的饥饿，他们可能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泪。

我们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毕业生，是该校最优秀的学生，是二十一中的骄傲，以后的学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运动把学校最优秀的教师驱尽赶绝，知识的圣地变成扼杀知识的场所。下面我引用 2000 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书《自由神的眼泪》第七章上的几行字：

“二十一中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驿站，在那里我得到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导。唯一讨厌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从哪里调来的校党支部书记，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的业务水平和举止。这位姓张的书记教政治，口齿迟钝，心神不定，翻来覆去讲不清，抠了鼻子，鼻屎擦在讲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灾区，包括校长王增庆到一大批最优秀的老师中箭落马，与这位不学无术权大无比的书记有直接关系。”

这个宽腮帮戴眼镜的张书记，名字我当时就没兴趣记，永远不知道，来了不久就替代王增庆教我们政治。王校长倒台后，张书记反右有功官运亨通，当了校长。好事成双，他春风得意，还娶了我们少先队总辅导员当老婆，她来我校时才十八九岁，中专毕业，小那张书记二十岁。我们听说后，都有一种癞蛤蟆吃到天鹅肉的感觉。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从家庭和学校而来。对于十二三岁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的优劣实在太重要，他常常决定孩子的提升和沉沦，这方面我的体会非常深。在我书里的第七章，我还写了：

“二十一中坐落在石灰市菜市场里，教室外嘈杂喧嚣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吵架打架声令我难于抗拒，同时，老师们勾魂摄魄的精彩讲课又令我神驰心往。我的心经常在两者之间徘徊，跑来跑去……老师们杰出的讲课把我往学校里拽，我想做个好学生；外面世界强烈的诱惑，令我脑子里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读书。各种力量拉扯的结果，合力为零。我原地不动，既未变好，也没有沉沦。”

没有沉沦，就意味着我不会永远在吃食店门口守嘴，站就站个坑，坐就坐个囱，我不会永远把时间花费在看猴戏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条街有的女孩，早恋、早孕、早婚……

没有以易冠九老师为首的那一批重庆市最顶尖的老师们，吸引我在教室里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进重庆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我就不可能完成“从猴子变成人”的进化。

哪怕我后来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老师们教给我们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我没有沉沦。

我絮絮叨叨讲老师对孩子有多重要，讲孩子离不开好老师，是为了说明老师们的恩德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老师们的辛苦应该获得全社会永远的感激。

但是，反右的恶行在中国大地发生，在毛泽东的操纵下，张书记这样的人像苍蝇一样会繁殖，全国到处都是，越优秀的老师越受他们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一个缩影，易冠九只是个典型，五十万、一百万右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由五七年开始，中国孩子的悲剧也由五七年开始。

我们要控诉反右运动的罪行，就要从一个人的遭遇开始；我们要求政府对右派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就应该把一个人一个人的付出，和以后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杀的奉献，彰显出来，公诸于众。

（新加坡 2007 年 5 月 5 日《新报》“纪念反右五十周年《往事知多少》专版”。）■

## 我的皮鞋成了“政治需要”

陈仁德

1977 年冬天，为了配合正在深入持久进行的基本路线（即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教育运动，我所在的那个公社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

搞忆苦思甜并不新鲜，那时每年都有运动，每次运动都毫无例外地要来一番忆苦思甜，一般都是由几位有经验的老农像背台词一样地说解放前为地主放牛，一年到头吃糠咽菜等等，然后大家一起吃忆苦饭，同声高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经过 20 多年的不断重复。一些人已成了忆苦专业户，一上台就说：“想起民国二十五年，我就两眼泪汪汪……”眼泪也就往下掉。（我真佩服他们，我也试过几次，但不行。）

不过这次的忆苦思甜与以往不同，除了老的一套照样进行外，还新增了一个实物展览。这本来也与我没太大的关系，反正到时候我去跟着唱“天上布满星”就行了。但是后来我竟也直接参与了忆苦思甜实物展览，准确地说不是我，而是我的一双皮鞋参与展览。

事情是这样的，筹备展览的县里来的工作组的同志们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些斗（量具）、秤、木棒等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于是斗就被赋予“地主的斗，吃人的口，倾不尽的血泪恨，装不完的阶级仇”的概念，木棒也就成了地主毒打贫下中农的工具。后来又找到了许多比较光鲜的衣裤，说是解放后贫下中农都穿上了好衣服；又找到了几只廉价的手表，说是翻身农奴当家做主如何如何。但最后竟无法找到一双稍稍像样点的皮鞋，这就让工作组的同志们有点沮丧了，贫下中农过着幸福的生活，无论怎么是应该有一双皮鞋的呀！

工作组的同志灵机一动，想到了我脚上那双亮闪闪的接尖皮鞋，于是便很委婉地找我谈话，先讲了一大通“政治需要”之类的理论，然后就要我把鞋脱给他们拿去展览。

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就顺从地把皮鞋脱给了他们。说实话，那皮鞋外面虽亮闪闪的，里面却是臭烘烘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几天后，忆苦思甜展览隆重开展，我随着人流走进展厅，一边唱着“天上布满星”，一边就看到了自己的那双皮鞋，居然被摆在很显眼的位置。靠近那双皮鞋的，是一双沾满泥土的烂草鞋，可能也是从哪位老农的脚上脱来的吧。在两双鞋下面是一张很大的纸，上面用浓墨写着，“请看，解放前贫下中农穿的是烂草鞋，解放后已经穿上了高级皮鞋”。我差点笑出声来，赶紧往前面看去了。

这次忆苦思甜展览引起了很大轰动，而且通过这次展览又培养出了几个觉悟很高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在现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展览结束后，县里来了通知，说这样的展览很好，要马上到全县 76 个公社以及县里各系统去巡回展出，让更多的人受教育。这样，我那双幸运的皮鞋便随着工作组在“天上布满星”的歌声中走遍了全县城乡。■

# “二黄”外调记

雷崇功

三生有幸，居然能住进如此宽绰的屋子。这是公社小会议室。四壁洁白——大约才粉刷过一个多月吧。屋角并拢的两张长椅子上放着一床旧被子，虽黄中带黑，但还认得出原来是白的。“床”边一张方桌，上面孤零零地放着一本书，是翻开的，标题上有红杠，是革委主任亲自指定的必读文件，限我三天背熟。房门口和桌子边还有两把长椅子。墙上挂着两幅宣传画，一律鲜红。这就是屋子里的全部陈设。

门口长椅上坐着一个小青年，不住地打着呵欠。他不多说话，很和善。比起前一阵的十人“警卫班”的气焰来，简直天上地下了。

我坐在那临时铺位的一端，也就是桌边，拿出昨天弟弟送来的叶子烟，一张一张地轻轻理开，慢慢地撕下骨头，又细细地撕成丝线一般的细条，放在一堆。将烟叶掐成一节一节的，又鉴别归类：最好的为第一类，有一点洞的为第二类，洞较多然而尚成块状的为第三类，太烂的为第四类，骨头丝为第五类。先拿第三类一张，加一些第四类的，再加第五类的几丝在中间，裹一个锥形，再用第二类的一张裹一层，最后用第一类一张像绑绑腿一样缠一道，就大功告成了。像雪茄烟那么长，中间大两头小，光光生生，比买的烟卷还精致些。只是没有糨糊，便在头子上轻轻一拧，成为一条细而尖又微翘的尾巴，生动极了，别致极了。

裹完一批，向门口那青年要个火，深深地吸一口，鼻孔里徐徐冒出两股青烟，一圈一圈袅袅上升。烟斗上的烟灰矗立不倒，像一支光亮的粉笔，我真不忍心抖掉。慢慢地品味，悠闲地欣赏，我陶醉了。良久，才找来棕叶，二十支捆成一捆，放在桌边；总共捆了五捆，剩三支零的。五捆烟用旧报纸包起，好大一封，如果放在摊上去卖，一定会招徕许多顾客。这样就消磨了大半天时间——看看太阳已经打斜。这把烟大约可以卷一天吧。

清阶（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是全区一号，想立功、升官、邀宠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曾经失势刚被“解放”的当权者和强弩之末的造反派——都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最大的鱼无论如何要网住。从大队游斗到公社重点突破，触及皮肉的暴风骤雨时有发生，我居然活下来了，而且，据说还长胖了，真是奇迹！而我的“爪牙”有两位“自绝于人民”，丢下白发老母和娇妻幼子，其中有我儿时的朋友金哥，牵连到他，我终生负疚，将另文悼念；另一位是与我淡交的太元，想不到会牵连到他。根据提审和外调的情况看，这一网至少牵连一百多人，唉，实在对不起许多朋友和一些素未谋面的无辜者。另有几位自杀未遂，还有几位被迫编造神话，公推我为“总头目”。我无处可推，无处可躲，只有硬抗。

记得在大队时，一个霜冻的清晨，大队周副支书——我远房侄女婿，平时很亲善——叫我交代组织纲领和章程，我没法写。他指两条路由我挑：一条是回屋去写，一条是下水塘捞沤肥的青柴。我脱了鞋袜，跳下结冰的水塘。钻心刺骨，一会儿双脚就麻木了。几次叫我起来，我不肯，反正感觉不到冷了。副支书无奈，叫我不写也起来。起来一看，鲜红的脚太漂亮了，虽走不稳，但还在发热呢。大队的千人斗争大会上，民兵连长周某声嘶力竭地领头呼口号，从“最大的……另一个……”到“省最大的……县最大的……”都“打倒”之后，就轮到“打倒反革命分子”我，我居然与刘、邓、李、董平起平坐了，有些荣幸，有些滑稽。有一个戴红袖套的小卒指着我说：“你还笑，笑什么？”我只有赶紧低头咬住嘴唇。

到公社后，我更煊赫了。那阵势——庞大的专案组、警卫（看守）班，外调人员游逛到甘肃、新疆、陕西、云南、重庆和全省各地，捞回不少稻草。轮班昼夜逼供，渣滓洞的法术也用上了。原来与我相熟的人，甚至亲善的人，也变了脸，如贺副书记三年前当小队会计时是我和堂弟交好的朋友，现在指挥吊打我了；看守班蒋班长原来是我棋友，读过书当过兵，算得上农村知识精英，我们同一个生

产队，交往甚多，而今虽不直接出手，但暗中指挥。真是人心叵测！置之死地而不让死，几次以“大案要案”报县公安局批捕，都被以“证据不足”退回了。于是更增加火力，轮番轰炸，可是也未将我煨熟——尽管已无完肤。这么惊天动地，这么兴师动众，这么鸡犬不宁，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真不甘心。我的日子不好过，他们的日子就好过吗？县公安局两次派人来找我，我请求带我走，我未进过真正的监狱，也许比这土牢美妙些吧。他们只笑笑，走了。于是，就将我转移到此闲置起来，看来我成了“鸡肋”——魏武大帝也不想啃。

紧张、激烈的日子过去了，成天坐在公馆里，实在太清闲了。我不知怎么收场，也不知他们怎么收场。无聊也无赖，只有回想着、等待着、观望着。时时有精彩的表演，只不知这胜过天方夜谭的滑稽闹剧的编剧和总导演是谁。今天怎么冷场了？

突然，门口喳喳的。仔细听，才知有人想进来，门卫不让。

“我老远来，就是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传得很神的，莫非有三头六臂？”一个老女人的声音。

“不行，得革委批。”

“看吧。”我走到门边，“我就这个板相。”

原来是个白发大娘，拄着竹杖，颤颤巍巍的。身边带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她们不眨眼地看了我十来分钟。“这个样儿，糟老头。我还以为……”失望地慢慢走了。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笑了。我这模样——

一会儿，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公社蒋秘书，穿一双厚皮鞋，挺着胸，头发向上耸立，大概要使矮小的身材显得魁梧些吧。后边两个比他高大些，都戴着鹅蛋大的像章，金煌煌的。一个上黄下蓝，一个上蓝下黄，大约是两弟兄合穿一套军装吧；不过，凭我的直觉，他们并没有当过兵，那衣服似乎太黄了一点，举动也不像。

“雷公，恭喜恭喜，你天天生意兴隆，外调的川流不息。”秘书幽默地一笑，“今天这两位同志找你，你要老实交代。”

我磕了磕烟灰，“唔”了一声，眼睛看着书上，静静地等他们开口。

秘书请那两人坐下，对他们笑一笑，走了。

那两人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上黄突然吼一声：

“站起来！叫你站起来！”

我缓缓站起来，依然不看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

“雷公。”

“多大岁数？”

“三十二。”

“才三十二？”

“唔。”

“你这个反动大学生，美美的工作不干，跑到农村来干什么？你犯了什么罪？”

“这个……请你们问公社——公社有命令，不准对外乱说。”

“哼，谁不知道你里通八个国家，你遥控指挥重庆武斗，谁不知道你是右派分子，谁不知道你是大同党的总头目嘛！”他见我嘴里仍在冒烟，也点燃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你认识哪些人？”

“很多，太多了。”

“哪些？”

“生产队全部，大队大部分，公社……”我使劲忍住笑。回过头去，门口那青年在掩住口咕咕地笑。

“金堂县认识哪些人？”

“很多，我们隔河就是金堂。”

“你在石龙公社认得哪些人？”绕这么大个圈子，还是自报家门了。

“不，一个也不认识。”

“不认识？哼！你去过石龙几次？”

“没有，有史以来就没有去过，石龙在哪一方也不知道。”

“装疯！今天我代表党，代表政府宣，宣……”

“你好好想想，”上黄还没有“宣”出来，坐在一旁静静抽烟的下黄搭腔了，“党的政策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别人早有揭发，你看，××年×月×日晚上，你和周××蒋××三个人在石龙东街喝了酒，还作了什么事？”

“我没有去过，我从娘胎里就不喝酒。”

“别人早就交代了，你说了还算你坦白的，不然，我们就要揭发了。”

“你们三个人都举起右手，宣，宣……”上黄又“宣”不出了。

“还是争取主动的好，你不是正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吗？”下黄正翻我案上的经典，“就看你何去何从了。”

“请你们揭发好了。”我突然感到索然无味。

“限你三分钟。”上黄看看表，手腕抬得高高的，凑近鼻眼，仍是金煌煌的，“一、二、三。怎么？”

“你的钟跑得太快了，不过，三天、三年也一样，我没去过。”

二黄一齐站起来，四目圆睁，气势汹汹，看来要扑过来挥拳了。

“二位，请到办公室坐坐。”秘书不知什么时候来的，“让他再反省反省。”

上黄哼了一声，抓起卷宗冲出门去，下黄慢慢跟着。秘书走在最后，出门前回头对我神秘地笑笑。我颓然倒在铺上，公社喇叭正在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着“万寿无疆身体健康”之声不绝，北京什么大会还在开吧。

突然感到肚子咕咕地叫，我于是不再朦胧，天快黑了，公社食堂又该施我半碗饭了吧。

2006.12 于彭山岷江畔 作者邮箱：feng <dafemg@qq.com> ■

## 一个勘探队员和一个护士的恋情

马万才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

祝亮，30 年代初期出生在一个贫困山区的自耕农家，靠祖上遗留下来的十来亩耕地，祝家的日子相对要比周边的佃农过得富裕一些，因此，祝亮和妹妹祝俐从小能有机会读书。可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祝家的成份竟被划成了富农。

土改时农民的主要矛头是针对于地主，况且祝亮的父母也亲自下田劳动，只不过在插秧、打谷时临时雇用一些雇工帮忙，且是酒肉相待，工钱给足。祝家这个“富农”只是在日常生活上相对过得富裕一些罢了。在青黄不接时，有贫困农民找到祝家借个三升两斗的，祝家也是有求必应，也不加利。因而祝家在乡邻中口碑较好，所以农民们对祝家这个“富农”也似有若无，从不难为他们。这样，祝亮才凭着自己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某大城市的一所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祝俐也在本县县立中学读到初中毕业。

祝亮在校品学兼优，靠助学金得以读到大学毕业。那时的大学生是全包分配的，祝亮毕业后被分配到本省地质局野外勘探队，当了一名勘探队员。因为工作出色，加之在大学里就已加入了共青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年多后，便被提升为队长。

祝亮虽然当了队长，但仍高唱着《勘探队员之歌》，和队友们一起，常年战斗在崇山峻岭之中，为国家寻找矿藏而忘我劳动。他们正当青春焕发，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在一次野外作业中，祝亮不慎从山崖上跌下，所幸被一颗树的枝桠挂了一下，让他侥幸捡得一条性命，但还是严重摔坏了腰，住进了队部所在地的县人民医院。负责他们那个病房的护士叫梁倩。

你看过电影《青春之歌》里谢芳扮演的林道静吗？端庄美丽，文静温柔，梁倩就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工作耐心细致，对病人态度和悦，给病人打针总是缓缓地推药，还不断地问病人疼不疼。有调皮的病人和她开玩笑：“只要你给我打针，再疼也不疼，疼死都值得。”这时，她总是红着脸报以一个微笑，双腮立即呈现出两个甜甜的酒窝。加之她一身洗得十分洁净的护士衣帽，宛如一只白鸽在病房里飞进飞出。病人们都很喜欢她，乐于和她打趣说笑，只要有她在，病房里的气氛便显得十分轻松活跃。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祝亮的腰伤大有好转，已经能够下床随意走动了。小伙子朝气蓬勃，精力旺盛，除自己生活上的事尽量自理外，还主动帮助打扫病房里的卫生，扶同室病人外出散步、上厕所等。病友们都夸他是个好小伙子。

二十三岁的祝亮，身高1.74米，方面大耳，身材魁伟，是个当地地质勘探队员的天然好料，也是一个合格的篮球运动员。实际上在上大学时，他就是校篮球队的队员。球赛中，他的投篮英姿往往引来观看的同学们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特别是女同学。

祝亮身上的阳刚之气、男性魅力，加之他在住院期中各方面的表现，在女护士梁倩心中孕育着一种朦朦胧胧、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觉。

一天，梁倩给祝亮发完药，偶然在他的枕边发现一本秦瘦鸥著的《秋海棠》，便顺手拿起随意翻阅起来。

“你喜欢看小说？”祝亮问。

“没得事随便翻翻。这本书你看完后借我看看好吗？”

“行，现在你就可以拿去。”

祝亮不仅在地质专业上技术过硬，还喜爱文学、音乐。他拉得一手好二胡。在地质队一份内部刊物《大地》上经常投稿，内容有技术方面的交流、探讨，也有抒写野外生活的诗歌、散文。

一个多月后，祝亮腰伤痊愈即将出院，临行前夜，小护士似乎恋恋不舍，祝亮也有同感。那晚恰好梁倩值夜班，趁其他病人都入睡后，二人在值班室里几乎作了通宵长谈。

祝亮回队后，领导上考虑到他的腰伤尚未完全痊愈，让他留队部作团支部书记并担任内业队长兼作队刊《大地》编辑。《大地》是不定期的综合性油印刊物，队员写稿，队员阅读，内容丰富，文章短小精悍，颇受队员们的好评。

领导上这样的安排正中祝亮下怀。每逢周末，他便和小护士相约在县城郊外半山腰上的禹王宫见面。

祝亮和梁倩虽是一见钟情，但经过多次接触、倾谈，相互增加了了解，加深了情感。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他们携手在禹王神像面前立下山盟海誓：“爱你生生世世，非你不娶。”“纵然海涸石烂，非你不嫁。”

这期间，局里调来一位转业军官担任队里的政治指导员，此人姓金名川久，30多岁，小学文化，党员，矮胖个子，右眼有点儿斜，说话瓮声瓮气，转业前在部队上是个连长。

俗话说，当兵三年，老母猪当成貂蝉。金某来队不久，便对内业组几个女大学生垂涎三尺，经常以做思想工作为由，找其中一个女技术员张萍谈话，有时还在夜间将张叫到他的寝室谈。开始时用语言试探挑逗，后来竟发展到动手动脚。张萍识透了他的卑鄙目的，气得摔门而出，从此再也不搭理这位流氓指导员，并将此情况向团支部书记祝亮作了汇报，因而与金川久结下仇怨。

1957年底，反“右派”斗争在队里开始，金某理所当然成为“反右”五人小组的领导成员。

在小组会上，祝亮发言：1、个别领导要加强业务知识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避免在工作中瞎指挥；2、要多深入野外小组，多了解些野外工作的实际情况，不要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空谈；3、对自己的生活作风要多加检点，尤其对女同志要尊重。4、野外生活补贴发放不合理，同样的劳动，为什么技术员每天1.6元，而工人、学徒每天只有0.8元，相差一倍（祝亮系技术员）？

在内业组的小组会上，张萍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个别领导人假公济私，思想腐败，品质恶劣，作风下流，根本不配作政治思想工作。

这些意见都被“反右”五人小组派去参加小组会的积极分子全部记录在案。

一天晚饭后祝亮和队友徐银雄（家庭系地主成份，其父土改时被镇压。）去县城郊外散步，不经意经过一农家猪圈，里面的大小猪仔因争食嚎叫着，撕咬着，打得冤冤不结。徐银雄问祝亮：“你说猪大爷们为什么要打架？”祝亮随口回答道：“这些猪争食，主要原因是政治不挂帅。”（那时报刊上正提各行各业要政治挂帅的口号）。这纯属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不料徐正是五人小组豢养的积极分子，当晚就把这件事向五人小组作了汇报。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夜晚，趁人们都睡觉了，大队部里彻夜灯火通明，五人小组和积极分子们摩拳擦掌，个个都在忙碌着。干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

第二天早晨，祝亮端着脸盆去厨房打水洗漱。路过队部大院时猛然发现，往天的大字报已不见踪影，换上的都是新大字报，且篇篇都是冲他祝亮而来。大字报在有“祝亮”名字的地方都用红笔打了“×”，来势十分凶猛，大有不置祝亮于死地决不收兵之势。

祝亮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院坝里一动不动。瞬间，走来两个积极份子，不由分说，强行将其押入早就布置好的“右派分子祝亮反省室”，并解下了祝亮的裤带，搜缴了随身携带的小刀。反省室小桌上备有纸、笔，一个积极分子勒令：“从现在起，你就老老实实地给我反省，把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详细地写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从此，积极分子们日夜轮班看守，软硬兼施，极力纠缠，不写就不让睡觉。一个星期过去了，祝亮只在纸上写了六个字：“我拥护共产党！”

随之转入大会批斗。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杀气腾腾。主席台顶端的横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子祝亮批斗大会”，会场四周还贴有诸如“打倒右派分子祝亮！”“祝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大标语。

积极分子们声色俱厉，争相发言，特别是那个徐银雄表现更为积极，还跑上台来按祝亮的头，踢祝亮的脚。发言内容尽是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如：“祝亮狗胆包天，竟敢与大右派储安平一个鼻孔出气，叫嚣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祝亮诬蔑党的领导，诬蔑党的领导就是反党……”“祝亮借口野外津贴发放不合理，妄图煽动工人起来闹事……”“祝亮竟敢把政治挂帅比着猪争食打架，罪该万死！”“祝亮富农阶级本性难改，妄图反攻倒算。”等等等等。

参加大会的百多名群众几乎无人发言。凭祝亮平时的为人和他一贯的表现，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谁也不信。这明明是在小组会上他给金某人提了意见遭到的明目张胆的报复。至于野外津贴，工人们从心眼儿里感激他都来不及，遑论给他提意见批斗他。可在这种情势和阵仗下，人人自危，谁愿惹火烧身，敢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中华民族自从“反右”运动开始，即造成了全国万马齐喑的局势，人人噤若寒蝉。以致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六十年代中期臭名昭著的文革运动得以畅行无阻，顺利出笼，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特别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灾难和损失！

继祝亮之后，小小一个百多人的勘探队又划出十多个“右派分子”（女技术员张萍也在其中）和七、八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在工人和学徒中划）。其中一名姓干的测工因不识时务公开写打油诗歌颂祝亮，被定为“坏分子”，在斗争会上还遭到积极分子们的毒打。

此后，这群一夜之间成为异类的“牛鬼蛇神”（政策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实际上已被归入阶级敌人一边，和地、富、反、坏一起，合称为“五类分子”）便在队里就地劳改：担水、扫地、挑菜，

甚至被弄到旱厕里去捉粪便中的蛆虫（灭蝇），总之只要能在精神上、肉体上能尽量折磨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

自从出事以后，祝亮日夜思念着梁倩，确切地说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他和梁倩今后怎么办？断绝吧，情感上实难割舍；继续保持关系吧，将永远使梁倩受到牵连。

几个月没有祝亮的消息，梁倩朦胧的意识中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几经打听，果然不出所料。她急切地跑到勘探队大队部要求见祝亮一面，但被拒绝了。

三个多月之后，这批无辜者的处分决定批下来了，分别有降职降薪，留队监督使用的，有送劳动教养的（实际上受到的对待比劳改犯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甘肃的夹边沟右派劳改农场、四川峨边的“415”信箱的右派）。有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的。祝亮属后者。

处分一经宣布，不仅立即解除了羁押。祝亮在思想上也像获得了某种解脱。临行前的一个下午，他去梁倩家向梁倩和她的父母辞行。

梁倩的父亲是一个大型机械厂的技师，母亲是该厂财务科的会计，都是知书达理之人，他们不干预女儿的私事，更没有因祝亮身份的改变而拒他于门外。他们把内心的忧虑隐藏起来，仍很热情地接待了祝亮。晚餐是丰盛的，还备有酒。饭毕，梁倩父母陪祝亮聊了一会儿便早早地休息了。

在梁倩的卧室里，两个心事重重，即将分别的年轻人通宵未眠。但谈话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即他们的关系是断还是续，双方各执一端形成拉锯战而无法得出结论。祝亮举一反三对梁倩晓以利害执意要断；而梁倩坚持他们双双曾经在禹王宫里立下的“十字誓言”死不赞同。她要和他一起回去当农民，或者立即结婚，让父亲在运输社为他暂时找一个拉架架车的工作。总之讨口都要为他背砂锅。她要学《秋海棠》里的罗湘绮，即使吴钧（秋海棠）最后面貌被毁，穷途末路也要人海觅踪生死相守。就这样往复迂回，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祝亮经梁倩苦留在她家住了三天。临行，梁倩把祝亮送到市上的火车站。“今朝离别去，何日君再来？”火车开出了很远很远，梁倩还痴痴地站在站台上向着东方远望。

此后，梁倩隔三差五地不断给祝亮写信，一是倾诉思念之情，二是鼓励他坚强起来，重塑人生。祝亮在回信中让梁倩放心，他还年轻，一定会好好地活下去。至于和梁倩的关系，始终低调或干脆避而不谈。

初夏的一个下午，祝亮正和农民们在田里薅秧，小妹祝俐突然跑来告诉他说有人找，是个年轻姑娘。祝亮三步并两步跑回家里，一时竟愣住了——梁倩事先连信也没透，竟千里迢迢只身来到这偏僻的村野找到了他的家。此时，母亲已在灶上忙活，须臾，给梁倩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荷包蛋：“幺女，走了这么远的路，快趁热垫一垫。”梁倩赶紧站起双手接过：“谢谢伯母。”梁倩吃着甜甜的荷包蛋，心中也是甜甜的，朦胧中有几分回家的感觉。看着头上已有几许白发的老人，心中萌生着一汪对慈母的爱意。

山村的夜降临得早，没有什么可娱乐的，农民们都习惯早早地睡觉。祝亮安排梁倩和小妹同住，梁倩却叫小妹先睡，说有些话要和她哥说。

祝亮卧室陈设简陋，一张老式的雕花木床，一个木柜权当书桌，一些地质专业书籍和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整齐地堆砌在柜上。床对面的墙上开着一扇木窗，窗外是茂密的竹林。这里还没有通电，一盏死气沉沉的煤油灯闪动着它那如豆的微光。

许久许久，两人都沉默着。最后还是梁倩打破了沉寂：“很意外是吧？看来阁下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并不欢迎。”

“你叫我说啥好嘛！从内心说我做梦都想见到你。可对这里的一切你今天也应该有个大概的了解了。更主要的是我现在的政治身份和家庭成份。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我和我的家人乡亲们都了解，虽说是监督劳动，但回家之后乡亲们并没有为难我。说实话，干农活是十分辛苦的。生活更清苦，一个月几乎吃不上一次肉，吃盐巴还得拿鸡蛋去换。我一个人再苦也认命了，要是再搭上你，我岂不是罪孽深重！我说梁倩，此事非同小可，这关系到你的一生。我希望你不要一时冲动，凭感情用事，应



该冷静下来仔细地反复思考，否则，你将会抱恨终生！”

“算了算了，又是这一套，老生常谈。说点儿别的吧。”

祝亮很无奈，露出一丝苦笑，沉然不语。

“祝亮，告诉你，我是团鱼吃秤砣---铁了心了！难道你真要我把心剜出来给你看吗？我这次加上轮休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大老远跑来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心里踏实，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至于我个人，你不必多虑，我看过川剧集锦中的《评雪辨踪》，刘翠萍寒窑三年还等来了吕蒙正中状元哩！我不相信你祝亮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再说，我是卫校毕业，以后在这里来申请办个医疗站，一来可以谋生，二来也可以为缺医少药的乡邻们做些好事，决不要你来供养我。总之，不管你说三道四，千万理由，我认死理了！从现在起，我生是你祝家的人，死是你祝家的鬼，你休想把我赶走！”

……

这夜，梁倩没有回到小妹房里去。

故事的尾声是：梁倩回去办了辞职手续，领了结婚证明，办了户口迁移，毅然返回山村，老老实实地做了祝家的媳妇。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随之而来的三年人祸，神州大地遍地饿殍，人数达三千七百余万，且百分之九十五是农民，不知祝亮一家可曾逃过此劫？■

## 倒下的是废墟，站起的是大写的人

——记长寿湖那些右派恩师

黄晓龙

**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

**不是一切梦想都被折断了翅膀**

**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和血印，而不展现欢容**

——舒婷

从1961年7月到1963年4月，我由水产校被压缩到长寿湖渔场劳动生活了20个月。加上在水产校的两年，在长寿湖足足生活了三年零八个月。

适逢那场席卷全国，持续三年，令数千万人成为饿殍的人祸。在深陷饥饿四顾茫然的境况下，命运极为难得地给了我一次眷顾——有幸让我认识了在长寿湖“劳动改造”的孙静轩、聂云岚等一批右派老师，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他们的引导和熏陶下，改变了我的一生。

### 在歌声中相知

我是1959年的初中毕业生。因为父亲早在解放初期就以“特嫌”罪名冤死狱中，数年后继父、大姐夫、三舅、九爸又相继被打成右派，升学志愿里原本填满重庆邮电校、省邮电校、省科技校等“保密”专业的我，接到的录取通知却是当年刚刚筹建，只有15个招生名额的重庆水产校（当年实际招收了46名）。

刚踏进这个以下放干部为师资主体的学校，还没来得及从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神话中醒来，每时每刻都在饥饿中备受煎熬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愕然降临。我曾几次惊恐地见过：刚刚还在校门外公路上偶偶而行的农民，突然曲膝弯腰，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倒地，而后断气的过程……也曾在饥肠雷鸣中酸楚无奈地体味过：同一块面团蒸出的馒头，老师一两一个，比学生二两一个还大，是因为“老师的馒头发得比学生泡”……

一次、同学们为伙食和课程安排牢骚蜂起，我仅仅附和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最好早点垮”，就被三番五次上纲为“攻击三面红旗”（理由是“水产校是大跃进的产物”）。也许还加上家庭的“黑”上加“黑”，加上两年来，几乎每节课都不得不借偷看小说以分散饥饿的折磨，加上第二学年“红五月”前夕，腰部受伤回渝治病，错过了为期一个月的双抢劳动等等。两年来、成绩始终在全班数一数二的我，第二学年考试刚刚结束，就被列入二十余名持有城市户口同学中唯一的“压缩对象”（其他十几名被“暂时休学一年”的同学均来自农村），被下放长寿湖劳动。

当时的长寿湖，名曰大型国营农场，但其生产方式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几无二致：一样使用原始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所获菲薄的劳动。我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每三五只“双飞燕”（由一人划双桨推进的小船）一组，沿用着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在使用的旋网、丝网，凭借体力、技巧，更得凭借运气，向大自然索取可怜的报酬。

打鱼是艰苦异常的，冬天冷雨严霜，手上开满冰口。夏天暴雨骄阳，汗流如注。“走到哪里黑就到哪里歇”，荒山野水，四处为家，但却有“天老大、我老二”般的自在。打到鱼、大家都饱餐一顿。打不到鱼，就得顿顿喝“吹吹稀饭”。直接简单的生存法则，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格外质朴简单。

尽管暂时离开了饥饿，但几乎每天都是昨天的重复，远离社会生活主流，仅能谋得“三饱一倒”而苦苦挣扎的生活现实，令人不能不对前途出路生出深重的迷惘和忧虑。在近期偶然找到的一本发黄的当年日记里，纪录着这样的感受：“飘过蓝天/掠过白云/双飞燕张开轻盈的翅膀/飞过水面蓝天/我不知道/在遥远的水平线下/是命运灿烂的微笑/还是青春阴暗的坟场？/我只知道/命运的斯芬克斯/以她似笑非笑的神秘/静候在远方”。尽管“做普通劳动者”“一切听从党安排”早已是流行和时尚，但就这样度过一生，实在于心不甘。

那时、中苏关系已明显恶化，从几经辗转到手的《参考消息》上，有关“人民公社加大锅清水汤”和“苏维埃加电气化加土豆烧牛肉”“核大战并不可怕”和“核大战一旦爆发，人类将全部毁灭，亲爱的中国同志，将由谁去建设共产主义”的争论，更令我出自本能地对未来命运感到忧虑、恐惧。

最初让我受到触动的，是由右派们最先唱起，而后在捕鱼队广泛流传的《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等外国名歌。每当暮色四起，群山远隐，三两只双飞燕的剪影，从朦胧的湖光山影下匆匆掠过，就会或远或近响起阵阵深沉、凝重、注满忧郁的悲怆旋律。令人恍然想象在严寒广袤的雪原上飞快驰过的雪橇，漫长得没有尽头的流放之路，在晦暗的命运前，那些苦苦坚守的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坚贞美丽的妻子……在迷茫和逆来顺受中几近麻木的心，就像被一只手轻轻抚过一样。

此时，我总是满怀向往地猜想：那些右派一定是在这些歌里注入了他们全部的人生感受，否则这些歌何以会如此动人。他们一定是想起了当初投身革命时的理想、抱负和热忱，想起因此遭遇的不平和坎坷……

记得有一姓罗的重庆某中学前音乐教师，个子不高却精干整洁，经常在狮子滩街上轻声哼着《嘉陵江上》或托赛里《小夜曲》转悠。每次相遇，他都热情邀我跟着他一起学唱《小夜曲》、《嘎娥丽泰》、《嘉陵江上》。

还有来自市总工会的右派老师邓万华，个子敦实，经常独自对着重庆方向，用他那厚重且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唱电影《宋景诗》的主题曲：“高高的吕梁山重山/咆哮的黄河水连天/山高水险难飞渡/黑旗还家难上难/大雁南飞过平原/黑旗转战又一年/官家财主把咱来害/仇报仇来冤报冤/黄河大浪向东流/黑旗转战又几秋/水流千转归大海/不渡黄河誓不休……”唱得人从满腹悲凉到热血贲张。很快就成了我的好友兼音乐老师。一到休息下班两人就凑到一起，在“不渡黄河誓不休”的悲怆放歌中，一起向往着何时能够解除流放和苦役，回到重庆，回到家乡。

最令我震撼，让我在歌声里感触到他们深藏于内心，誓与苦难抗争到底的桀骜和骨气的，是《川江号子》。

1962年初夏，捕鱼队在同心湾作业，晚餐正要结束时，从学习班方向隐隐飘来一阵《川江号子》：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以徐缓的“哎——哟哟”领唱，与低沉的划桨合唱声“嗨左，哟哟”紧紧呼应。在月影星辉交相重叠、湾岔众多、空旷寂静里颇多神秘的湖上回旋。令人不由想起童年、故乡，冬天上学路上透过厚重阴湿的浓雾，从江上飘来的号子……那种久违的亲切和熟悉，令人心头发颤。

有人喊了一声“走”，几只双飞燕立即扑进湖心，在急促的“哗、哗”水声里，争先恐后向学习班方向奔去。

赶到学习班院坝时，《川江号子》刚好进入激烈昂扬的高潮。在人称“范大汉”的范围瑞（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响彻行云般的领唱下，正在纳凉的人们，全都加入合唱，与他配合默契前后呼应。激越的旋律里响彻着浪花的喷溅，江流的湍急呼啸，仿佛那滴着水珠颤颤悠悠的纤索已将生死搏斗下的热血贲张勒进了肩头……那已经不是在抒情、在陶醉，而是借助歌声让悲愤在痛快地喷发着男儿的血性、呐喊和呼号。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触摸到这些平日在沉默中低眉内敛的人们，那坚硬异常的骨质。烈火般炽热的胸襟。

回到船上，就着马灯，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十余行的短诗：“哎——嗨/仿佛是一阵悠远的长风/自高天云缝间洒下/紧接着，是炙热的岩浆从地底贲薄而出/从四十八张宽阔的胸膛涌出沉雷般的呼唤/于是、四十八人的腰挺直了/四十八双腿迈开了/从四十八张宽阔的胸膛里喷出这沉雷般的呼号/……永远不会在重压下弯曲的脊梁/肩负着我们的时代……”

也许正是这首小诗唤起了孙静轩老师的共鸣，才使素以“白眼向青天”而著称的他接纳了我这个尚在诗歌殿堂门外徘徊的学生。

### “死硬右派”及右派中的“左派”

最令人迷醉的是晚炊之后：三五只“双飞燕”系在一起，“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水天澄彻的月影星辉下，在浩淼空阔，“逢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讲他们真实而惊人的“反动言论”，和各具特色的抗争。讲他们的传奇般的革命经历，讲他们因为反对什么、主张什么、说过些什么，因为无意中与谁结怨而被打成右派。

李南力，陈孟汀，卢光特，孙静轩，吕琳，谭显殷，詹光……这些当年满怀理想，为建立自由、民主、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义无反顾选择了革命的热血青年；解放初期的高干，诗人、作家、艺术家，时下的“死硬右派”们，在随时面对生与死的绝境下，居然还有指点江山，粪土王侯的气概。

记得1962年初夏，渔场当局印发了一份有关“阶级斗争”的学习材料。其主要内容是谭显殷，曹贞干、高志长几个前团市委右派，攻击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散布自然灾害恐慌，甚至回忆以前吃过的菜肴，借以“打精神牙祭”的“反动言论”。那些直逼生活真实，犀利异常的判断和思辨，对我们这些在言不由衷的假话中昏昏欲睡的年青人，不仅有一种痛快淋漓的宣泄快感，更对这些从未谋面，却活得真实而勇敢的右派生出强烈的敬意和好感。

不久，我从旋网队分到绳钩班，所谓绳钩班，不过是将我们五人连船带人租给长寿县长江渔业社的渔民，每人一船专为渔民划船。一叶孤舟窝棚，从拂晓到深夜，每天如孤雁穿越在寂然无声、人迹罕至，满目衰草枯树、烟水茫茫的湖港湾岔。在每天两次，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单调中，如牲口般在沉默和孤独中重复着划船、收钩、取鱼、排钩、放钩、煮饭、睡觉的流程。枯燥疲惫，仿佛被遗弃世外的感觉。使渴望交流、渴望友谊的愿望格外强烈。

好在每隔三四天，绳钩师傅就得返回狮子滩乘车去长寿卖鱼，收集蚯蚓，最快也得第二天中午方能返回。这本是珍贵难得的二十几小时，却因几个好友都分散在渔场各处而难得相聚。经常能在狮子滩见到，并引起兴趣，能够交流的，唯有那些轮休上街的右派老师。

记得是一次搭乘绳钩船回同心学习班，在争着划船的近四小时行程中，一路海阔天空的愉快交流，使我和陈初蓉、邢传俊很快就结下了忘年交式的友谊。他们的谦和开朗，热忱又不乏自信和矜持，没

有丝毫颓唐的泰然，令人顿生好感信赖。陈初蓉原是市委宣传部干部，邢传俊曾经是原副市长邓垦的秘书，据说都是为一个朋友鸣不平才被划为右派。由于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话题。但邢传俊谈起市委某领导时一脸鄙夷地说的“啥本事都没得，只晓得搞女人”，陈初蓉说的“好吃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时隔半个世纪还栩栩如生。

最令我敬佩的是，即使在饥饿和恐怖下，那些右派也活得勇敢且有尊严。据说曾经被毛泽东称之为“红小鬼、自己人”，因为坚持“旅行写诗”，对抗延安文艺讲话精神而获罪的诗人孙静轩。一次和某下放干部发生争执，当恼羞成怒的对方照例以“对抗改造”为口实准备动粗时，孙静轩毫不犹豫地提起一只桨脚道：“不错、我是右派，但更是人，今天你只要动一根指头，老子这一百把斤就不要了！”吓得那个一向欺软怕硬的干部再也不敢吱声。以致捕鱼队的年青人一谈起他，都伸出拇指直道“好汉”。

不仅我们这些身处“化外”的“打鱼仔”，甚至一些良知未泯的管理干部，也对那些“死硬右派”充满敬意。时任渔场机械厂厂长的肖伯均，私下里曾好几次对我讲过卢光铁的传奇经历：这个当年还在预备期的重大党员学生，在组织突遭破坏时逃回地处川鄂边界的家乡，利用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起党组织和地下武装。解放后，在市委组织部处长任上，因为才华出众和直言不讳而遭至嫉恨，竟然在审干时被当成假党员隔离审查（据说经他发展入党的好几个湖北籍党员，当时已官至省委部长、厅长），而后又理所当然地被划成极右。他不仅始终拒绝承认“反党罪行”，还不时语出惊人地针砭时弊。即使多次被批斗，被“打态度”，却从来都是以冷硬的沉默应对，绝不认错，令肖伯均每每谈起都敬佩不已。

尽管初出茅庐，但“特嫌”加右派的“家庭出身”，个人遭遇的屡屡不公，使我至少懂得所谓“反动言论”多是深藏于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实感受和思考。但在处处充满逢迎、假话和做戏的现实中，有几人敢于直接说出来？反右的前车之鉴，眼前右派们正挣扎其中的生存绝境，便是现实样板的“必然下场”。但偏偏就是这些被打入另册，身处逆境的“死硬右派”才敢于直言。即使如渔场当局所说，那是“破罐破摔”，但没有直面真实的大勇，没有随时准备为真话付出代价的担当，谁敢？

至今，只要一想起长寿湖，就会想起狮子滩阴沉晦暗的天空，积满泥浆的公路，秋风萧瑟下的冷雨，想起那些三三两两，或者偶偶独行，穿着开花棉袄，肩挎帆布挎包，足蹬溅满泥浆的长筒胶靴，一边走一边贪婪香甜地喝着清得像米汤一样的稀饭，脸呈菜色，面目浮肿，神态各异的右派。想起曾经数次亲历过的恐怖场景。

1960年在农场青滩工区参加双抢，我和四五个手握稻秧站在水田里的同学，曾战战兢兢、满怀惊恐地隔着四五根田坎，远望着工区大门前，几个彪形大汉，将一个“装病”的右派，拳打脚踢得满地打滚。那个右派“我不是装病，我不是装病呀”的惨叫，吓得我们几个同学直到吃午饭时，端碗的手都在微微打颤。

还是那年10月，参加农场飞龙工区的双秋（秋收秋种）会战，因为饥不择食，开荒时大嚼茅草根，不久就腹痛如绞，赶到医务室时，那位一向和蔼亲切的女医生，正对一个面目浮肿脸色惨白的右派连声喝叱，“赏”给他一粒止痛片后，对他一再要求多给几粒的苦苦哀求，硬是不理不睬脸若冰霜。见我颇有戚色不忍，这位医生半是开导半是辩解地对我道：“小黄，你莫看他们现在可怜，你不知道，他们向党进攻时，一个个西装革履眼睛朝上的样子，我一想起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当然不知道：此时这个右派遭遇的凌辱，令我不由想起了同是右派的四伯（继父），林哥哥，三舅和九爸，也许他们也正在遭遇着同样的羞辱。想起当年和这位医生一样“立场坚定”的嫡亲七婶，在课堂上对年仅13岁的我整整一节课泼妇式地诅咒和羞辱。按捺着不断涌起的不平和鄙夷，我假装懵懂地问她：“X医生，啥子叫西装革履？眼睛朝上是不是翻白眼？是不是这样？”说完，满是鄙夷和愤怒地盯着她。趁她一阵惊愕，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我连忙假装内急，哎哟哎哟地叫着急急躲开。深恐控制不住，说漏嘴被抓住把柄。

我也见识过“左”得出奇的右派。1962年夏天，中苏论战已见端倪，在中国痛批苏联的“土豆烧

牛肉”共产主义的同时，“土豆烧牛肉”几个字所唤起的联想，一直令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们暗中艳羡不已。一天下午，在同心学习班的集体宿舍里，我第一次惊愕地听到了那位有名的讽刺诗人“我一听到土豆烧牛肉就想吐”的忠诚表白。正当我既愤怒疑惑却又不知如何应对，只能用鄙夷的眼光死死盯着那位诗人时，不知何时走近的聂云岚老师急忙站出来圆场：“小黄，欢迎、欢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著名的讽刺诗人 X 老师 XXX，X 老师是我们这里的大才子，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他只看一两遍就可以一字不漏背下来。以后你可要多向他请教哟！”不由分说地拉着我远远避开。在送我回船的路上，陈初蓉反复嘱我，以后千万要离这个人远一点，学习班里惟他最左，都知道他言不由衷，但却个个都怕他。听人讲，有时嘻嘻哈哈的“龙门阵”吹得正欢，他会突然跳出来抓住某人一句话，正气凛然地大声呵斥：“你反动！”令所有人都汗毛直竖。

## 我的“右派”老师

还在水产校时，我就多次听文学课老师以无不惋惜的口气，讲起正在农场劳改的大诗人孙静轩：据说这个 13 岁就参加革命，颇富才华的青年诗人，就是因为坚持旅行写诗，不愿深入生活，对抗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堕落”成了右派。尽管不黯世事，但我的继父，大姐夫，三舅，九爸（反右前，他们分别是 16 中教师，北碚区委宣传部干部，云南有色金属选矿实验室总工，高教部部长助理。除继父外都有从事地下学运的经历。）被打成右派的家庭遭遇，使我很早就懂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过是那些手握大权，毫无道德约束，从来不遵守道义规则的忌贤妒能者，那些随时都想着踩在别人的头上升官发财的小人、恶人，借运动之机清除异己的借口而已。

那时渔场新来了几百名应届高中生。其中颇不乏“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阶级觉悟”极高的“积极分子”。尽管只有几人，但一旦领教就深知其恐怖。只要一言不慎，一句无意出轨马上就会被抓住辫子，当面大义凛然地指出你的“问题”。如果不服气争起来，最后闹到领导那里去，则是毫无悬念。更恐怖的是在毫无觉察中，他们会不动声色的把你的话在心里过筛，一旦抓住把柄就向领导汇报。你就会在学习会上被当成靶子，遭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以至吃过几次苦头后，每有这些人在场，我就不得不变成刺猬“每时每刻都向世界放射着警惕的利剑/而自己也被剑包围”。那种喧闹中的孤独，如临深渊般的恐怖，无异度日如年。所以，自那以后只要有离开他们的机会，我就往右派堆里凑。在那里周围都是善意的目光，还有那么多新奇的观念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绝不会将你的某句话作为告密打小报告的素材。尽管无论是他们和我，都小心翼翼地极力回避着那些敏感话题。

于是，我和右派们的接触日益频繁随意起来，每走进他们当中就有一种久违的熟悉随意和亲切。

聂老师，还有水产界的老前辈王效舍，还有那个高大结实、大而且黑亮的眼睛始终溢满笑意和自信的女右派崔京生，那个相貌英俊举止儒雅潇洒，说话总是带着微笑慢声细语娓娓道来，年仅 22 岁就在钢铁设计院被划成右派的小伙子（惭愧、我至今一直想不起他的姓名）。还有身材高大匀称，走路虎虎生风的篮球运动员蔡志奎，把叶子烟卷成雪茄状随时含在嘴上的体委裁判王成福，三四月份了还载着一顶贝雷帽的画家吕琳……可能他们早已经忘了我，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耳边还响着他们一口一个“小黄”充满暖意和关切的招呼声。

还在初中时我就读过孙静轩的《海洋抒情诗》，《献给母亲的河流》。那些年、已经对饥饿有着刻骨铭心体验的我，每读起后者“在无数个黄昏/在浑黄的河边/我久久地/和船上那个赤身露体的孩子/用饥饿的眼睛默默对望”，“在汨汨水声里/我倾听着船夫脚底的皮肉和船板摩擦时/那低沉的叹息”……总是升起一阵感同身受般的迷惘和凄凉。自那时起，从小就喜欢读诗写诗，一直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诗人的我，就暗自生出一定要拜见这个大名鼎鼎诗人的强烈愿望。

1962 年盛夏，趁返渝探亲前夕的空隙，确知孙静轩老师就在同心岛右派学习班后，我忐忑不安地抄了几首小诗，附上一封请教信，通过邮局直接给他寄去。回到重庆仅三天，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就飞到了重庆家中。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在给了我“看得出来，在诗歌创作上，你是有前途的”，“我

愿意在今后给你更多的帮助”的同时，也希望我能提高文学素养、认知能力，增加生活、社会阅历。信末、还邀我于8月28日和他面晤。

首次在农场招待所见面，是他和李武贞正式结婚登记的日子，也是他将离开狮子滩，前往省文联报到的前夜。我这个一心幻想着通过写诗改变命运的少年，是这场婚礼的唯一参加者。没有丝毫拘束、忐忑和不安，我们谈诗、谈文学，谈那场令党内良知、中国良知集体陷落、禁声的“反右斗争”，谈自那以后，个人、家庭的命运、经历和感受。直到晚上10点方才分手。这个早就以“白眼向青天”和“孙浪子”而著称，并因之开罪了不少权贵的诗人，除了谦和，质朴，和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率真、热情外，竟没有丝毫傲慢和矜持。照他的话说“真实是诗的第一生命”。

孙老师的鼓励，对在迷惘无助中徘徊的我，无异是一道明丽的曙光，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唐诗、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那些美好崇高的情感，那些睿智博大而又迷人的文字境界，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划船时默诵，休息时手不释卷，我完全沉醉在先贤们的思想和文字意境中。

精神的充实，必然引来从性格到习惯的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和右派老师们的频繁接触，公开称他们为老师，不由引来了某些急切盼望着“立功”，藉以获得高升的人的关注。

### 陷阱前的侥幸

大约在当年9月，时任捕鱼队副大队长，脸上随时挂满天使般优雅亲切的微笑，令我一直颇为信赖的原水产校总务主任，在一次偶然相遇的闲聊中，看似无意地问起我对未来的想法，毫无戒备的我，竟天真地以为是老师的关心，将成为诗人的向往，对孙老师的感激和崇敬，不吐不快地倾泻而出。不久、在捕鱼队的“社教”动员学习会上，就是这位副大队长，在“补充几句”时，突然一改平日的温文尔雅，声色俱厉地用那双藏在眼镜后面高深莫测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有觉悟的普通劳动者，不是精神贵族！更不是公开对右派分子一口一个老师的人！这个阶级立场和大是大非前存在严重倾向的人，如果不迷途知返马上回头，就是这次社教的重点！”

尽管自此、我就对这位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老师充满鄙夷，敬鬼神远之。但绝对没有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

1963年初，我被调到水研所，宿舍就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的我，则依然保持着每晚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并和与我仅一墙之隔，经常就元曲、《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名句和轶事典故为我解惑的聂云岚老师，结成了师生加朋友式的，长达一生的情谊。

大约是当年3月，当《雷锋日记》成为每天学习的唯一内容时，一度“暂缓”的社教运动重新启动。我突然由水研所的繁殖试验组调整到基建组，每天和几个右派、历反（历史反革命）一起，和砂浆，挑片石。以往亲密来往的同学，突然对我躲躲闪闪唯恐避之不及。这才使我猛然醒悟：几个月前那位“老师”的威胁，正在成为日益逼近的现实。

现在想来，我之所成为典型，是因为开展社教运动需要一个反面典型。而恰好我又是和右派老师们走得最近，最公开而没有顾忌的一个。尽管，除了音乐、文学和人生际遇，我们对那些敏感话题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但因为组织需要，运动需要，这份幸运就得“不是也是”的属于我。

正当我惊惶不安却又束手无策，如待宰羔羊般战战兢兢时，同在水研所基建组一位右派老师，在劳动中看似不经意地对我暗示：“劳动法里规定，有病不能劳动就可以申请因病退职”令我顿时茅塞顿开，当天就以曾在水产校课业劳动时腰部曾经受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申请》，在长达半月的时间内，每顿只喝一两稀饭装病。每当饿得快要挺不住时，住在宿舍里间，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聂云岚老师，多次趁四下无人，或假他小儿子丹陵（当时是一个拖着鼻涕，尚未上小学的小孩）之手，偷偷塞给我一两个包谷粑，才使我从饥饿、恐惧中挺了过来。最终获得了农场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恩准。现在想来，这个条件是人事科那些良知尚存，但又深恐事后遭到追究的

干部们绞尽脑汁才作出的进退有据的万全之策。也许，为了日后有回旋余地，他们也留了一手：以派出所所长不在狮子滩办不了迁移为由，让我空手回重庆等待。

### 无处栖身

早在当年春节，得知多数“出身反动家庭”的初中同学，凭着优异成绩考进了大学后，一直艳羡不已。此时回到重庆，我就兴致勃勃地投入紧张的复习，准备参加当年高考。（初中毕业时因为家庭困难，无力供我读普高，使我和大学失之交臂，一直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和伤痛。）但直到5月中旬，高考报名即将开始，户口依然杳如黄鹤，令在40中任音乐教师的母亲急了。她匆匆调了两天课，加上星期日，只身赶往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当得知我因为和右派交往密切，已经受到党委高度关注，两手空空气急败坏地返回重庆时，又在楼下的信箱里发现了孙静轩老师的来信。早已在历次运动中吓成了惊弓之鸟的她，立即招来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弟姐妹，召开了紧急家庭会。先动之以亲情，后晓之以利害，对我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我立即断绝同右派老师的来往，并交出孙老师的所有来信，从长寿湖换回户口。如果我照办，家里将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否则家里拒绝接受我。

我清楚，一旦回到长寿湖，不去揭发那些有恩于我的右派老师，就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这个本已风雨飘摇的家，将陷入更为支离破碎的困境。但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做人的起码原则，却不容我按“组织意图”反诬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深深敬重那些右派恩师，是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懂得了在物质利益和荣辱之上，还有更高、更值得用一生去坚守的道义和操守。我更清楚，唯有心地磊落，品德高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叛卖恩师和友人就是堕落的开始。我抬出林哥哥，三舅，四伯（继父）、九爸被打成右派的事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和理解。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日里一直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们，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了。尽管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却始终坚持要我断绝同右派老师的往来，毫不退让。

我当然拒不从命，直至僵持到午夜，方才不欢而散。

自此，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每天放学回家，不是对我视而不见就是厉声呵斥，力图逼我就范。由于户口被扣，没有粮食定量。一旦断绝了家人勒紧裤带省下的粮食，生存顿时就陷入绝境。但为维持起码的尊严，争一口“饿气”，我开始了清早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觉，整天泡在市中区图书馆的半流浪生涯。靠黄珏、武辉夏、严中和几个朋友，更有当时正在重庆养病的聂云岚老师的慷慨接济，经常一天只啃一个烧饼，饥一顿饱一顿地熬过了那个夏天。

眼看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户口依然不见踪影，本该理直气壮向长寿湖索回户口的我，却不敢踏进狮子滩半步——回重庆探亲的渔场同事满怀惊恐地向我透露，社教已经开始，在动员会上，党委领导已经点名称我为“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我清楚，如果此时回到狮子滩，不仅拿不回户口，肯定将成为那些急于向上爬的人们最中意、最现成的垫脚石。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透露给我的：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依然是空手而归。

大学梦如美丽的肥皂泡迅速破灭，绝望怨愤中，我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昼夜呆望着混浊的江水，好几次在露宿于河边的噩梦中醒来后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还年轻，人生还有多种选择，稍遇挫折就去死岂不是太窝囊，太没有出息！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认错”，去诬陷我的恩师，老子绝不上套！读不了大学老子照样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圆我的诗人梦。总有一天他们会将户口寄还给我。于是，我倔犟地打起精神，照样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去聂老师家，听他讲述、探讨和欣赏唐诗、宋词、元曲中的那些名篇佳句和轶事传闻。或者如痴如醉身临其境般听他讲《基度山恩仇记》、《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讲经他精心改编的《玉娇龙》……忘记了命运的狰狞。

高考结束不久，收到了长寿湖寄回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信封上的邮戳刚好是高考结束的7月7日。

看来，扣着户口，不让我有任何参考的机会，早就是长寿湖当局对我最起码的惩戒底线。

每当回忆起当年的倔犟和选择，我一直怀有庆幸和骄傲：没有右派恩师们的潜移默化，也许我就会在斤斤算计眼前的蝇头小利中，蝇营狗苟浑浑噩噩地度过此生。尽管因为“不识时务”，不甘“与时俱进”令我多次与“机会”擦肩而过，终身与金钱和权势无缘。但我的良心始终是干净的，人格是完整的。也因此使我在那些或身居高位、或拥有巨额财富，但在利益诱惑前依然一脸媚颜，膝盖腰椎始终拘偻着的同辈前，多一份清醒、自矜和骄傲。

考不了大学，但毕竟户口到手，本可在重庆找一份工作，哪怕是临时工，一边谋生一边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在这有四个右派亲人的家里，自得知我已被定性为“被右派分子拉过去的小青年”之后，吓得惊恐不已的母亲，用令人辛酸的冷漠与沉默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我是一个将会给全家照来祸端的灾星……

这熟悉亲切的故乡，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村，我已别无选择。

1963年7月，大竹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走投无路的我，当即报了名。

8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上，历经了几个绝望难眠的昼夜后，我终于平静下来。以近乎“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决绝，随同120名知青，登上大竹驻军的六辆军车，离开了十多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之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之久，交织着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徨与追求，放弃和坚守的人生之旅。

时隔多年，每当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往事，母亲就愧疚不已。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年代，为保住这个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家，难道还有别的选择？牺牲理想、践踏道义、甚至断绝骨肉亲情，以换取现实安全的悲剧，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

## 燕京大学的悲剧

倪良山

每当我重返燕园，漫步于未名湖边的山麓曲径，望着默默无语的湖光塔影，总要忆起燕京大学的往事。随即想到燕园已经易主，这里已改为北京大学，心头会泛起物是人非的今昔感慨。当年燕京大学曾在这里创造了33年的辉煌业绩，顷刻之间竟烟消云散，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燕京大学创业艰辛 燕大始建于1919年，是由北平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美英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学校董事会聘请司徒雷登任校长。他受命之后，于1922年靠徒步、骑自行车、骑毛驴，跑遍北平四郊，寻觅踏勘新校址。最后相中位于海淀的前清亲王赐园，睿王园旧址。它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的产业。几经磋商，以六万块大洋买下，作为燕大的建校基地。1922~1936年，司徒雷登先后十次前往美国，殚思竭虑，通过基督教会募捐。终于为燕大筹集了相当充裕的创办基金。

司徒雷登又延聘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专家亨利·墨菲进行设计。他巧妙构思，以未名湖为中心，将中国古代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内含相结合，以布局合理的总体设计，建成美仑美奂、如诗如画的现代高等学府。燕大建成后，一些来华讲学的欧美学者，对燕园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一流的campus!

燕大机构精炼，注重实效，把师资力量摆在首位。对海内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待遇，一视同仁。只要学有专长，不论思想观点、学术流派，均重金礼聘执教。使燕大名师云集，学者荟萃，极一时之盛。外籍教授有埃德加·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国内包括留学载誉归来和内地著名学者教授，如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



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徐献瑜等。

司徒雷登从圣经中“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两句格言，归纳而成：“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作为燕大校训。

燕大崇尚民主自由学风，创造了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学术团体百花齐放的宽松宽容教学环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之外，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其他课程。按要求修够学分即达毕业标准。当年我主修经济学，但曾先后选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课程。从而充实了学术基础，拓宽了知识视野；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和应对工作需要准备了有利条件。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不仅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国之命运》；也有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需要，在书海中自由选读或研究；并得到尊重，无人干扰。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关系融为一体，亲密无间，形成凝聚力极强的“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在燕大被撤消近六十年后，每年的返校节，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校友，仍然从海内外重聚燕园，坚持参加校庆活动。

燕大创建不久，即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逐步形成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燕大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讲授不同源流、不同背景的文化，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誉满遐迩。燕大在短暂的教育生命中，培养了众多知识精英，成为各学科的出类拔萃人才，如黄昆、黄华、谢婉莹（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褚圣麟、候祥麟、候仁之、朱启平、周南、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阎简弼、赵兰坤、黄笃修、蒋彦永，等等。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即有燕大校友五十多人。

司徒雷登为燕大向国际学术交流拓宽道路，1925~1928年，他争得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通过这一渠道，培养了许多有名学者，如费正清、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

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考察，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确认其毕业生资格，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燕大教学的辉煌成就，也使司徒雷登获得殊荣：1930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为奖励其创办燕大的功绩而授予勋章。

燕大建校33年，便发展成富有传奇色彩的名牌大学，在国际教育界、学术界赢得一席显荣之地。环顾当今国内众多高等学府，可谓无能出其右者。当然也找不出一位像司徒雷登、陆志韦那样尊重教育、无私奉献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了！

燕大曾饱经忧患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后，燕大变成孤悬敌后的抗日堡垒，师生坚持抗日活动，日寇恨之入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燕园，把师生赶出校门。将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洪业等14名教授，和李慰祖、刘子健、李欧、孙以亮等10名学生关进日寇宪兵队监狱；将司徒雷登、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外籍人士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共抓捕三十余人。燕大师生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日寇侵占燕园后，将其用作伤兵医院和马厩。优美秀丽的燕园被日寇糟蹋得满目疮痍，污秽不堪。燕大蒙难，遭受奇耻大辱。司徒雷登等被关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从集中营获释。

流亡大后方的燕大师生，经历艰苦创业，于1942年使燕大在成都复校。1946年因雅尔塔密约引发的反苏大游行，成都燕大在中共地下党主导下，抵制了这次游行，致学校被砸，再度蒙难。为此，成都燕大曾被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誉为“民主堡垒”。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率先在北平复校。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围困了燕园，强行进校搜捕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倾学生。在美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燕大没被抓走一人。军警令学生集中于贝公楼大礼堂，逐个检查。燕大第三次蒙难受辱。在208师林团长监督下的师生大会上，陆志韦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把这次搜查与日寇入侵燕园相提并论，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贬损。陆校长的高风亮节形象，得到普遍赞扬。

在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岁月里，燕大师生忍辱负重，以大无畏精神，坚毅地顶住磨难和压力，没有倒下去，终于从荆棘丛生的坎坷征途上闯过来了。

燕大对革命有所贡献。1926年3月18日，燕大学生参加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最后通牒的请愿活动，燕大女生魏士毅壮烈牺牲。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直到1948年8月19日大搜捕，每次的抗日救亡、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以及护校、迎接解放，燕大师生都与清华、北大同学一道，担当北平学运的主力军。有许多燕大学生先后投奔延安和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为解放事业作出很大贡献，甚至牺牲了生命。有不少燕大学生成为革命中流砥柱和知名人士，如黄华、周南、韩叙、张大中等。张东荪教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遗余力奔走，功不可没。此外，抗日初期，邓颖超患了肺病，曾化名潜来燕大，由斯诺介绍在包贵思教授家疗养，并得到陆志韦校长照拂。据旅美校友蒲耀琼忆述，司徒雷登同情中共，每月都用部分工薪，通过林迈可教授捐献给八路军。等等。历史证明，燕大师生无愧于伟大的时代，丰功伟绩定将彪炳千秋。

燕大也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1948年解放战争逼近北平时，毛曾两度电令林彪等，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及名胜古迹。1949年夏，邓颖超专程到燕大，代表中央和周恩来，看望陆志韦校长。1951年12月燕大由私立改为公立，并经毛泽东任命陆志韦为第一任校长。毛还亲笔为燕大题写校名，由彭真送到燕大。燕大以毛的笔迹制成匾额悬挂西校门，并制成校徽，供全校师生佩戴。

狂飙呼啸，悲剧启幕。

上述光环和耀眼迷采，迅即消失无影无踪。阶级斗争狂飙呼啸而至，令人心碎的悲剧拉开大幕。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校长、张东荪、赵紫宸等教授遭受了严酷凌辱和批斗；有的教授如齐思和、陈芳芝等被逼痛哭流涕检查交代；聂崇歧教授被隔离反省；有的教授被斗得跪地呼求饶命。还唆使陆校长女儿陆瑶华大义灭亲，上台揭批生父，造成极坏影响。

在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乘势迅猛前进，以院系调整名义，一举宣布撤消燕大，燕大师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扫地出门。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史上，曾经辉煌33年的燕京大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西校门的燕京大学校匾被摘下，换上北京大学校匾。燕园更易新主。燕大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积累的全部校产，竟为北大幸运地唾手而得。实践了《诗经》的名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一所高等学府，燕京大学，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许多人认为，即使论功行赏轮不到燕大，也不该将其一脚踢开。那么，为何抹掉燕大？权威人士分析：可能由于燕大沾了美国的边，成为亲苏反美“一边倒”的殉葬品；也许因毛《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判定和其后两个“凡是”的作用；或者由于燕大沾了教会的边而被株连。但是，燕大在学运中一向反美；燕大宗教自由，师生绝大多数与宗教无关；而且1951年已改为公立大学，与美国及宗教切断关系了。两个“凡是”早已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不应再以昔日的死者来压今日的活人。这些都不是抹掉燕大的缘由了。有识之士应振臂高呼：还燕大以生存权！

燕大悲剧仍有尾声。大陆抹掉燕大之后，旅美与在台湾的许多燕大师生及有关人士，曾为在台湾复校而奔走。当时美国托事部存有燕大的一笔巨款，复校所需人力、财力均无问题。但是由于历史上燕大一些师生的拥共反蒋的左倾表现，而不见容于台湾，蒋中正先生断然拒绝燕大在台复校。其后，

美国托事部用支持燕大的基金在台办了东海大学。为此，燕大处于左右夹攻之中，立锥无地，求生无门，成为可悲的历史弃儿。当年追随中共、反美反蒋的那些燕大师生，积极投身革命的左倾志士，竟扮演了母校的掘墓人角色。这些掘墓人，极少数获得机遇幸运攀升，官至省部级，从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分得一杯羹；而绝大多数均遭整肃(包括笔者在内)，戴帽、流放、打入炼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会沦为墓俑，为母校殉葬；这也无异于搬石砸脚，自吞苦果，成为燕大悲剧里最可悲的角色。可以设想，当年蒋中正先生对燕大师生拥共反蒋，必然非常恼火。碍于美国关系，难于整饬。毛泽东砍掉燕大，无异于为蒋消除郁积胸中多年的块垒，去掉心病。因此，毛氏此举，是干了亲痛仇快的大蠢事!大陆不容燕大，台湾又岂能见容!燕大的悲剧角色铁定了!可悲之至!

今天沉痛追思怀念燕大，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母校师生中，在历次政治运动的受难者，非正常死亡者，受到不公正对待者。例如，1949年春溺水未名湖的研究生候国聘；以及其后非正常死亡的，如张东荪、阎简弼、蒋荫恩、沈迺章、许政扬；姚祖彝、李铿、孙会鑫、顾之安、陆志韦，等等。特别是张东荪一家的悲惨遭遇：张东荪作为哲学家，其学术生命已于1949年死亡。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他投了毛的反对票。毛查明后，记恨在心。从此注定其全家命运的终结。1951年中共以“泄露机密”为由，开始整肃张东荪；1968年1月被捕，1973年庚死狱中。夫人刘拙如也被批斗并关押1年；长子张宗炳是昆虫学家，下狱后精神错乱；次子张宗燧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遭批斗而自杀；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也因被批斗与妻吕乃朴一起自杀；长孙张鹤慈与次孙张佑慈分别被判16年、15年重刑。张东荪早年因爱国抗日而被关进日本监狱，尚能生还；待关进中共监狱，再也不能生还。祖孙三代人遭受毁灭性迫害，家破人亡，实属旷古奇冤，无法无天至极!陆志韦校长文革中再遭凌辱批斗，下放河南，历尽折磨而致沉疴，获准回京后，夫人已逝，家无亲人，瞬即悒郁辞世。一代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爱国敬业、高风亮节的大师学者，竟落得如此可悲结局，天乎痛哉!

回顾燕大夭殇，再放眼全球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社会公益事业，理应受到社会尊重和国家爱护，而不该随政治变迁兴替；教育绝对不是政党的玩偶或工具，可由党魁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建于1261年，校史均已七、八百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建于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建于1746年，这些大学都建于美国开国之前，校史均已二、三百年了。这些世界著名的大学，经过多次政局变迁和人事更迭而巍然屹立，毫发无损，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最早的大学是上海交大，建于1896年，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史只有一百一十几年而已。这与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极不相称的，也反映了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侧面，令人羞愧汗颜。面对中西大学教育发展的惊人差距，回顾燕大的辉煌业绩和不幸夭殇，无情的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一个多么值得反省的尖锐问题啊!拥有965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何以不能容纳一个燕京大学!我坚信历史一定会给出公道说法和正确裁决。

燕大的北京校友会同仁，呕心沥血，力争创办了“燕京研究院”，并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纪念碑。在海外校友和大陆官方的努力下，杭州市把位于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修缮，对外开放。司徒雷登的骨灰也得以来杭州落地。各路校友煞费苦心地保存了燕京和燕京大学的痕迹，供后人追思和怀念；也只有这点珍贵而依稀的雪泥鸿爪，或许能唤起人们穿过近六十年云谲波诡的历史风雨，重温燕京大学的33年辉煌一梦吧!

May20, 2010 脱稿于京东 ■

# 语焉不详的诡譎

## 老 赵

河南郑州有一个年轻人史宗伟，倡议大家“说真话”、“做真人”，还写了一本书《说真话做真人》。我看过了这本书之后，把情况告诉了另一位年轻朋友（这里说年轻是说比我年轻。具体来说就是 57 年划右时，我是工作了六年的机关干部，他则是北大二年级的学生）。这位朋友笑笑说：“这个人有病没有？”

2008 年在网上就见过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倡议大家“说真话”。后来好像没有了下文。想必是不了了之了。

这问题的提出，作为一个年轻人，好像挺简单，挺天真。但以我八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教训来看，那就颇有点复杂。弄不好还得惹出麻烦来。

### 一、真话，首先要看谁来说。

57 年反右运动中，北大有位学生难友王书瑶，他在一张大字报中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政论家阿克顿勋爵在其著作——《自由和权力浅说》中的话：“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结果构成了他的“右派罪行”。连“教养”带劳动，整了他二十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谈到腐化问题时，几次也谈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王书瑶为此就搞不通：“为什么 20 年前我说就是右派，20 年后邓说就是共产党各级干部应该警惕遵循的道理？”

其实原因也简单：“谁有权，谁就有解释权，同样一句话，他说就没问题，你说就是大问题。”

不光是北大学生，北大老校长不也是有口难辩吗？1957 年 3 月 2 日，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的问题。当时在场的毛泽东说：“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三个月之后，马寅初把发言整理成文：《新人口论》一发表，就又成了马尔萨斯言论。要不是考虑影响，周恩来、陈云力保，差点儿被打成右派。

1959 年，康生说：“计划生育是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举。”

马老当时大胆争辩，辩也没用，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最后耿直的马老虽未划右，却被免职。最为吊诡的是，把马老的话他们拿来再说就成了他们的“创举”。

1958 年 4 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作风，一般说来同国民党有原则区别。但有一部分也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个别有的超过国民党。”

这话是真话，别人谁敢这么说，谁说谁是污蔑、丑化党，立刻能打你“反革命”，投入监狱。毫不含糊。

### 二、必须有解释权

1957 年各路宣传机器一齐开动：“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把三百多万人楞打成“右派”。（1958 年 5 月 3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共打右派 3178470 人。1978 年中共中央 55 号、11 号文件给右派“改正”时，说是 55 万人。）当时按毛始皇的意思要给扣“反革命”，只是宽大处理，说成人民内部矛盾，才给创始了一个新罪名——“右派”。

当时群众心里也有看法，但你敢说吗？你说真话就打你右派。没得说。

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说：

“……把一大批人错划了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

击面宽了，大批的人处理不适当，许多朋友和同志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制……”

经过胡耀邦的开明力挺，20多年的政治迫害才翻转过来，“改正”了。但是谁搞歪了的？谁错了？谁负责？挨了整的还得倒过来“申请”，请求整错人的人开恩给“改正”。这道理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历史上搞错别人的人没有这样狂的。

都以为右派问题真正解决，也就是说已经真的改正了。不料，近几年内部有规定，又有了“原右派分子”的“隐形帽子”，又贵列“维稳对象”。要求党员与其“划清界限”。那“改正”的话语是真是假，谁说得清？也许解释权又变了，你要问谁，都说“不知道”。大概作风也变了——不好说的事就给你装 YTD。

### 三、权力政治，真是假来，假是真

有位朋友，他的父亲是老干部，局级。“大跃进”时回家乡，亲戚、老乡纷纷向他诉苦，真实地反映“挨饿”的情况，他认为这绝对是真实的，回到北京，给“组织上”写了一份“情况汇报”。作为一个老党员，把民间疾苦反映给党是党员的义务。不料“组织上”说他是“右倾思想”。老同志真有股犟劲，不服，和彭德怀犯了同一个毛病。自费又回老家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回来拿翔实的调查材料，居然和组织去理论。显然这是鸡蛋碰石头，这下正式给他扣了一项“右倾分子”的帽子。他就是气“炸”了也没用。说他调查来的是污蔑党的假情况。农民兄弟现在生活很幸福，公社食堂伙食很好，个个吃得红光满面。

官丢了不说，还给他来了“株连”，把从北大外语系毕业的儿子，发落到西北的边远地区。

直到文革后给“右倾分子”平反，才给老先生平反。但此时老先生已经去世五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馑，反映真实情况叫作“右倾分子”，两代挨整。搞了大饥馑的是谁？没有人指出。更没有人负责。几千万人命的大事没人负责。还不许人说清楚。

为什么？就因为权力政治。假的不许人说假；真的又不许你实说。

### 四、真话必须“神”归西天才敢说一点

无产阶级本来是唯物主义者，可他要信起神来比唯心主义者还要虔诚。几十年乃至一生都不会变的。

1962年，在庐山，彭德怀为农民“鼓与呼”，说的是真话。结果怎么样？被打成“右倾”，文革中整得死去活来。一直到1974年含冤而死，死后还不得不用假名“王川”把骨灰藏在四川才得以保全。1978年12月24日，才平反。

当年，庐山会议那么多高级干部都不知道饿死人？怕丢官，怕吃亏，跟着神害人。冤案谁造成的？是神，不敢说。

“大跃进”饿死3700万人（根据杨继绳先生《墓碑》），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说了百分之七十的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闯了大祸。法律都成了“屁话”。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挨打、按头、跪下，打得遍体鳞伤。那时候，他作为国家主席竟然天真地提出让他全家到农村落户当农民。毒招还没有来完，哪能放过你？最后给他来的是开除出党，还选择了他七十岁生日那天对他宣布，可以说极尽侮辱诽谤之能事。送到河南在所谓医疗过程中百般伤害，给不给用药，用什么药，都得经过北京派来的军人同意。折腾死他，连名字都给他改成刘在黄。死后根据中共中央（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火化”。一直到毛皇驾崩，1980年5月7日，才给他平反，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他可以说是说实话付出代价最大的共产党员了。

说起来共产党员都是大公无私的。但是实际上都怕丢掉乌纱帽，和入党时就想得到的各种特种经济待遇。宁愿意说假话。口头上说好听的，谁也不说真话。这是共产党几十年来政治教育的伟大成果，充分利用了人的“自私自利”，把大多数人教育成了典型的机会主义份子。整死人还得让他的子女说：

“感谢党，我一定划清界限。”这一点才可以说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固然平反了，把一个国家主席整到如此地步，承认了冤屈。谁的罪责？谁敢追究责任？谁还敢再说真话？

共产党内的诸如刘、彭等大批人等都被平反了，“冤案”是谁造成的，已经不言自明，为什么有些机会主义分子至今还大肆吹捧“冤案”的“责任者”呢？那都是那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靠“左”、“害人”而获取经济利益的家伙。他们懂得：只要共产党存在，“左”就是取利的灵丹妙药。什么叫道德良心？那能值几分钱？

## 五、真话，假话，就是不让你说话

最近共产党把他们党内的“救党派”辛子陵给“维稳”了。说他引用《大纪元》的不实信息污蔑了领导。没什么新鲜的，还是扣“帽子”。《大纪元》是某某功的网站。不给你扣反动帽子焉能镇住你？后来有人指出，那信息在澳洲早已炒了半年多了，原始材料是澳洲报纸。

对其“维稳”的是北京市领导（现在流行称官为“领导”。如“市领导”、“部领导”、“省领导”。不露姓名。到处是领导，领导无其数），既然你说他引用了不实材料，那么你倒说说真实情况是什么？他们不说，也没准儿他们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没什么真才实学，狐假虎威，奉旨行事的糊涂官。

说“救党派”辛子陵宣扬了错误思想。那么你们倒说说“正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认识？他们又说不出。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位朋友又给形象化了，叫作：“知识分子碰上黑社会，更没法讲理。”

不管怎么样，拿出了杀手锏——再说话就取消你的待遇。用党员的特供待遇的“组织手段”镇住了老辛。

说实话，那待遇不都是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吗？

你又说错了话了，谁叫你说实话的？那是党创造的财富，国家、地上、地下的资源通通的属于党，党想怎样处理使用就怎样处理使用！想给谁就给谁。哪儿那么多废话？！拿了百姓原有和创造的资源财富，回过头来又用以收拾老百姓，这办法绝对是发展了马克思理论的高招。

接着，还暗中运作发起要公诉写了真话文章的茅于軾。

茅于軾说的话是真话，是事实。纵观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史，就拿已经“平反”的来说，彭德怀、习仲勋、贺龙、陶铸、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刘少奇……挨整的时候，你们的上层人物，谁站出来讲过真话？替这些人说过一句公道话？而你们哪一个不是拿“跟着害人”来保护自己？然后又讲漂亮话，再叫别人“讲真话”的？整的时候，你们一百个拥护，平反的时候你们也一百个赞成。你们真的是在阴谋诡计中成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既然是人民的政府，既然代表着人民，那就来一次全民大辩论嘛，让人民来评说。

当然，你们也可以搞假“全民”，历史上，你们搞的假“全民”也不少，哪次运动你们不搞假全民？难道没有以“人民”的名义干过为害人民的事？搞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光彩吗？

这就有点纳闷儿，难道这些当头儿的就不知道邓小平也曾说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的话吗？

前一阵子不是不明不白地推崇过孔夫子吗？他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不是也叫人讲实话吗？

紧接着，听说了一则笑话。郑州的年轻人史宗伟也被郑州的公安“维稳”了。

我倒真搞不明白，郑州公安怎么和这个年轻人作“维稳谈”？

不许你说真话？

写一个以后说假话，不说真话的保证书？

在他的胸前挂一个可以被监听的录音器？

或者干脆给他吃点哑吧药？

……

反正真话，假话，看样子就是不让你说话了。

话说到这里，本来应该停止了。不料我订的一份小报《报刊文摘》送来了。那头版第一条消息的标题竟然是：《瞭望东方周刊》刊文提出，将“讲真话”提升为“国家课题”。

《瞭望东方周刊》是新华社办的刊物，新华社是共产党的官方通讯社。这官方通讯社倡议“说真话”，会不会和史宗伟的结局一样，招来公安部对其“维稳”谈话？如果没对他“维稳”，这会不会是一种钓真话的“诱饵”？

这也许会给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史宗伟一个实证：对《瞭》刊不“维稳”，对他就要“维稳”。

共产党官方却没有正式表示，人究竟该说真话还是假话。■

## 吴宓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

何蜀

在重庆出版社 2003 年 9 月出版的《当代重庆简史》（俞荣根、张凤琦主编，编委会由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及宣传部门官员组成）一书里，称吴宓在 1957 年那场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见该书 161 页），此说大谬。

吴宓和陈寅恪一样，逃过了“反右派”这一浩劫。

吴宓为何没有被打成右派？

在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的《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三联书店 2006 年 4 月第一版）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反右派运动的记载。从中可大体了解到吴宓得以幸免 1957 之祸的原因（本文所引文字凡只注页码者均出自此书第三册）。

### 在“鸣放”中“谨慎止默”

吴宓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全校聆丘晓讲八大文件学习解答。颇忧危。”丘晓是当时西南师范学院政治系主任。这“颇忧危”三字，殊堪玩味。吴宓“忧危”什么呢？从他记录的八大文件学习解答要点中即可察知一二：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必须由党领导。彼疑党（外行）不克领导科学与艺术者，大误。因反对‘公式、概念、教条主义’而反对 Marxism-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对 Socialism-Communism（引者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是乃资产阶级思想之恶意进攻，必须从严镇压剪除。E. G.（引者注：即“例如”）《草木篇》（诗）。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及作品，必须进行批判。”

“‘百家争鸣’≠唯心主义可鸣。凡百争论，必符合实际，而归准于 Marx-Leninism（引者注：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认为今乃解除压制，许旧说蜂起，此则大误。”

“党之领导=马列主义+中国革命之实践。或谓：共产党只能领导革命、政治，而不谙业务，不能办学校；此大误。”（38—39 页）

这个“八大文件学习解答”报告，等于给吴宓敲响了警钟。这成为他在“鸣放”中保持“谨慎止默”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月 12 日，吴宓日记中记载：“宓归舍，思最近又复加强管制，固党国之所有事，然其办法，一切惟据密报，到处调查，不但人人自危，抑且是非不明。”议及某教师授课无能而以向校领导告密得

到信任时，他叹道：“……庸碌而反见重，皆可证明当局措施之失。一校如此，国事或亦类是欤！”（47页）

4月26日：“夕6——7张永青院长来……，意在慰问宓，劝令大胆争鸣，畅言无隐。”（68页）

5月8日：“上午8——10撰《再谈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约六百字）拟今日下午政治学习会中讲述（终未及讲）。”（75页）

5月11日：“上午8：30至12：15，又下午2：30至6：30在会议厅开全体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永青院长主席，党委委员皆列席。宓本被命发言，旋以人争欲有言，遂自止。”

争着发言的人当中，头一个就是后来被打成西师头号“大右派”的教育系教授董时光。据吴宓记录其发言要点有：“痛斥党员之优越感与自卑感（文化低）。党员应（一）信群众（二）善鉴别人。年轻党、团员应（一）多近有学识之人士（二）服从真理。群众不应（一）人云亦云（二）谄谀（三）有见识而无勇气（四）应坚持真理。党员之文化太低者，必欲领导高等学校，应‘不耻下问’，最好‘教授治校’。次述光1953到西师后之遭遇及不平……”（77页）

5月13日：“上午8：30至12：00，又下午2：30至7：20会议厅续开全校教授、副教授、讲师学习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张院长一再敦促，宓声明‘决撰文登《学习通报》，今不发言’云云。”（80页）

吴宓的未得到机会发言和不发言，与那些大胆“鸣放”争相发言者相比，自然就使他不曾被当作整肃对象了。

5月21日，学院党委办公室通知吴宓次日进城参加市委召开的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会，全校受邀名额15名，历史系5名。吴宓“承诺赴会”。但次日大雨，吴宓晨起即“作柬，上党委办公室，以小病辞昨约，不入城赴市委座谈会。”他又躲过了一次在“鸣放”中出头露面的机会。

不过，当天下午吴宓仍然在历史系“分组鸣放座谈会”上作了发言。据当天日记记载：“宓以豫（引者注：会议主持人、历史系主任郭豫才）促，乃述说（一）《重庆日报》未刊之宓《再谈》一文之内容，着重简字（引者注：指对简化字的意见）。（二）1956二月宓退出讲课之实事，院长始终慰留。（三）评薪，宓曾坚辞新二级，但与俞平伯、贺麟及楼光来、郭斌龢等之一级、三级相比；又宓捐书值一万数千元，假作分月还值，余生难尽，故宓卒坦然接受新二级，云云。”（90页）

吴宓的发言，不但没有指责校领导对他不重视，反而为校领导辩护，这与当时许多批评校领导的意见相比，自然也是能得到领导欣赏的。

5月29日下午：“全院教职员在大礼堂，聆张院长之《帮助党委整风动员报告》，甚简短。”次日吴宓即“应邀赴座谈会，对党委领导工作提意见，助党委整风。老教师到者二十余人。”吴宓直到下午会议将散时，才接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作了毫无批评领导内容的无关痛痒的发言：“作片语，赞成郝君主张以教育系教授出任附中校长，云云。”（95页）

5月31日下午：“续赴党委召集之座谈会，市委鲁大东、张文澄、陈孟汀又某女士列席。”“吴宓续完原稿。附言（壹）条……（贰）条，谓‘宝钗殉情，黛玉任性’，豫最宜为史系主任，但良之功殊不可没云云。”“宓续述新、沧等对良之误会及沧1957四月改变工作计划，不按法定程序行事，以见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云云。休息时，张院长命宓以发言稿送登《院刊》，宓诺之。”（96页）

这是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三位市委大员坐镇：鲁大东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文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孟汀是市委文教部长（张、陈后来都被打成了大右派，“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吴宓的发言仍然是不批评领导，反而说“知识分子每人需自新”，颇有点“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味道。

6月5日上午：“赴院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张院长主席，商应付学生办法。宓中间发言一次，以抗战前，疏散前各大学之旧事为比较，主张因势利导，或藉学生所尊重之教授出而说服之，勿使学生放纵趋于极端，甚至互相斗殴云云。旋聆良主张完全放任可保无恙，又津述京津学校近情，知宓言不合



时宜。更聆李家庆发言，侈称党自有把握，必能收拾，毫不畏惧，其有‘阶级’之异志即定遭膺惩云云，悔必代党作杞人之忧矣。”（99页）

下午“赖澄同中三学生六人来，请宓参加今晚之文科学生大会并演讲，宓力辞却，与诸君谈半小时，指斥（一）1951前后土改中之焚毁大批书籍。（二）今之不重印旧日通行之木刻、石印、铅版之书籍。不及校政。访梓，未遇。与戴蕃璠同访梓，未遇。戴君亦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云云。”吴宓与学生谈话中，虽然有“指斥”两条，但都只限于书籍问题，而且“不及校政”。戴蕃璠与他谈到“不信党与政府之诚意，主张发言宜慎”，自然更加强了他要谨言慎行的想法。

晚，“史系学生邀赴史系学生鸣放会，未赴。”（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100页）

6月6日午后，“史系四年级学生三人来，邀赴本届毕业生之鸣放大会。宓略述所知事实，而辞不赴会。又有邀赴今晚之大会者，亦辞。”晚“回舍时，经过大礼堂，学生大会，董时光方演说，大受欢迎（鼓掌）。11：00散。开桂归报会中钢、光及孙铭勋等发言情形，皆放火鼓动，宓殊不赞同者也。”

（100—101页）“开桂”即邹开桂，是帮助吴宓料理家务的晚辈亲戚。孙铭勋原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继承人，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兼中共党支部书记（孙原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老地下党员），但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即遭到批斗，含冤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公职，后调西南师院中文系任教，这次又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6月8日，“学生会代表三人来，今日下午开学生座谈会，谈论人民教师之地位，请宓致开会词，以教育系诸教授皆另有事，宓推辞。”（102页）

下午院务委员会议决设立问题处理小组，“组员七人，刘又辛为之首，而宓与焉，再三辞之不获，只有勉任，不免于事急之时，以‘德高望重’为人作挡箭牌，而费时损神，尤其余事也。”（102页）

6月10日，历史系学生“约演讲，宓却之，改约访问。”（103页）

6月23日，吴宓致信成都老友穆济波，“力陈全身免祸之义，极劝济波及朴谨慎止默，并主张百花诗社立即停办解散，至少宓必坚辞各职”，同时他另函百花诗社社务委员会，“辞却研究部主任、文艺理论小组召集人、驻渝陪社务委员各职”。（115—116页）“百花诗社”是由穆济波（时为四川省图书馆副馆长）与王云凡（时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原四川名士）发起，刚于1957年端午节在成都成立的诗词唱和民间社团。在吴宓的日记中未见诗社成立的相关记载，吴宓当时也未去成都，估计是老友们将他列名于诗社中来信通知他的。“朴”应指范朴斋（1895—1970），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曾长期担任民盟主席张澜的秘书，是四川民盟的核心人物。这几位均被打成了“右派”。

### 在“反右”中“惟祈速死”

6月11日，“晨，广播中，学生已有拥护党、校，斥责反动之言论，并举昨物理系教员休息室之反动标语为例。按此标语‘毛□□，狗屁不通’，实无意义，本可‘见怪不怪’，而乃重视而利用之，是以知风向已转矣。”（104页）

6月13日，“晚，巡读大字报、黑板报，一片检讨、肃反之声。”（106页）

6月14日，“近日‘鸣放’之情势及方向骤变，各地工人及民主党派一片检讨斥责之声，斥责章伯钧、储安平、葛佩琦、董时光等‘右派分子’为反党、反工人阶级、反社会主义，要求惩办。即本校教授如陈东原、罗容梓等，主张校内可不设党委会领导者，亦横遭非议。于是‘鸣放’之事遂息，加强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与再行肃反澄清，将继之而起。目前实际之结果，惟学生得‘减轻考试负担’而已。宓于是不得不服周邦式之老成谄练，而自信谨慎和平，尚无过分之言论，差可免祸全身也矣。今后恐即文字改革亦不敢参加异议，舍‘忍舍止默’外，无他途也。”（108页）

6月15日，“下午……第三十二次院务委员会议，宓发言一次，谓（一）鸣放虽可继续，但实际

其事已终，对出言狂悖（如董时光）与主张错误（如陈东原、罗容梓）者，宜勿加罪戾，仍予尊礼，以昭激劝。”（109页）

接下来，吴宓又在6月20日的问题处理小组会议上讨论拟定各小组委员名单时，进一步发他的“谬论”：“宓主张聘陈东原、罗容梓及方敬参加，众颺之。”（113页）

6月17日，“遂访董时光谈叙，且慰之。董谓，彼无所惧怯，但今已安心读译书，不再发言，云云。”（111页）

6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叹道：“政治、道德、文学，皆不容我等稍参末议矣。”（111页）

6月19日，“按今日下午民盟、九三学社均在本校开会，陈东原已在民盟自行检讨。……宓按今日之《重庆日报》刊登毛主席两篇讲话之全文，乃既经修改者，与前所传宣者颇有出入。中间列出六条，明示立论之界限，倘早明白宣布，诸多放言越轨之人或可无罪。未免近于孟子之所谓‘罔民’矣。”（113页）

吴宓这时已经明确指出毛泽东搞“鸣放”是“罔民”了。

6月21日，“夕5：00至6：30全校大礼堂聆张院长讲《本校之鸣放与整风》。”院长讲话中总结了整风提出的群众观点不足、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外，号召反击右派：“请全院同志及同学皆积极参加此对右派分子之政治斗争、阶级斗争。”（114页）

6月22日，“学生会所主办，而以‘声讨’或‘纠正’、‘批判’为职志之各报记者纷来访问。”来访的有中文系一年级《论坛报》、历史系四年级《海燕报》、某系《战鼓报》、历史系《大礼堂论坛》等报记者（学生），“宓答所问，略谓毛主席讲话总结过去，指示现在，启发未来，乃极完备、系统、精要之大文章，其中六条及《宪法》，应为一切学习及批判之标准，对右派分子及右派思想，宜分别轻重，根据事实，而作批判处理云云。”“谓学生中，因日前出言激烈而今深悔且忧惧者甚多。宓教以宜善为慰解，以求安定与团结。并述宓对董、陈、罗三先生之观评。”（115页）

6月23日，“出观大字报，千篇一律，声讨董时光而已。宓昨（1）答《论坛报》问，今乃在《红星》大字报登出，只二条，（一）现在是继续鸣放，不是‘收’。按，实则鸣放已全息，无一人陈一议之事矣。（引者注：“按”后一句原为小号字）（二）毛主席之《讲话》极伟大正确，‘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启示未来’。余略而未登。”（116页）

6月24日，“据云，学生之大多数，皆惜毛主席六条之不早宣示，皆忠于党国，而信董时光虽激烈而非叛逆，云云。”（116页）

“晚大礼堂集会，托等一二教授演说，同一内容，顾观众与听者人数寥寥矣。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117页）

6月25日下午历史系工会第三小组政治学习批判右派分子座谈会，“宓以第二人发言，略谓（1）毛主席讲话未印布前，宓鸣放之内容，犹能暗合于其中六条标准，未尝越轨。（2）述宓在校内各座谈会鸣放发言之内容，兼及陈东原、罗容梓教授所主张取消党委会之确切办法，非反对党之治校（引者注：此7字原为小号字）以为二君回护。（3）述宓与董时光、罗隆基之交识，及对二人之评判，云云。”（117页）

6月27日，“近日全国空气紧张，专务大索右派分子，讪发及攻诋者极多，本校则董时光、陈东原、曹慕樊及史二学生团员（引者注：‘团员’二字原为小号字）朱永隆，并为众矢之的矣。”（119页）

7月2日下午，“大礼堂聚聆张永青院长讲《西南师院反击右派分子之运动》。”（121页）

7月3日下午，“赴第三十七次院务委员会‘如何继续开展反右派之斗争’。宓发言一次，赞成系科按工会分组座谈，以表示宓非有意沉默而已。会中李家庆言：‘有某教授，其所作文，深密周到，毫无火气，但实主张取消校内一切大小党组织，比之董时光，尤为彻底反动，因之，毒害亦较深’云

云。宓欲质问其人为谁，请明言之，免我等自疑惧。然三思而止，未言。后知乃指樊（引者注：此5字原为小号字。“樊”即中文系教师曹慕樊），”（122—123页）

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者皆佞佞侃侃，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工谄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123页）

“晚张正东来，陪宓操场散步，亦谓右派本已由党委判定，且事实调查清楚，而必如此大张声势，令人惊慑者，只为对全体师生加强思想改造，必其完全服从耳，云云。宓昔固主张开明专制。按古今国家，专制之极，而形式上极端民主，未有如今日□□□□□者也。”（124页）

7月7日，“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125页）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128页）

7月27日，“昨夕今朝今午三次广播责数赵德勋之罪。其述勋之言已印发专集（引者注：‘已印发专集’5字原为小号字）有曰：（1）共党今不能以十年前在延安边区办训练班之法，办高等学校。（2）古之人，对人先信而治学主存疑；今则反之，对人不示信，处处疑虑提防，而对学问则盲信，不加思考。广播斥之曰，勋之言（1）谓党不能办学，即是‘反党’。（2）是攻诋马列主义为教条。故勋乃罪大恶极，云云。呜呼，勋之言即宓之言，亦即全国千万知识分子之言，而言之将有过于勋兹所言者。彼拒谏饰非，虚僑锢闭，其共党衰微之始兆欤？”（138页）

称这些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即宓之言，亦即全国千万知识分子之言”，这是对“反右”运动何等尖锐的抨击！

接下来，吴宓写了一大段议论：“由近日之运动学习，宓深明党与人民政府之政策方针如下：（一）全遵马列主义之学说与苏联之经验，以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引者注：‘代表无产阶级’6字原为小号字）中央、地方层层专政之制度与阶级斗争之办法，统治全中国，为苏联之羽翼。（二）中国之宗教、历史、文化，中国人之道德、风俗、习惯，尤其中国之文字，决全部废除，并加以曲解与‘改革’。（三）思想与教育，亦必全为政治服务，高等学校中，专用工农出身之党团员青年教师授课，对所谓‘知识分子’与‘老教师’，既不容许其授课讲谈，亦不利用其知识学问，但给厚薪优礼，以示尊贤重士，使各得安居颐养，不责以工作，不计其成绩，只望其在运动中、开会时申明自己之态度立场，歌功颂德，遵令守法，以为群众表率而已。平时则须恭顺含默，不露圭角，欣和愉快，毫无愤郁，且不偶语，无私议，不作危言激论，更不宜发为建议，有所陈说，露才扬己，盖□□□极不欢迎党外人、异我者之热心爱国爱校也。按西师教师同人中，其自处自律，凡不同于以上所描叙者，皆必罹祸。……宓以遵此而行，故获苟全，此次幸免于难，然而残年枯生，何益何乐？一切志意感情事业著作都无，则生已如死，故不若早获安息之为愈耳。是故宓近来实由忧生而有乐死之心。”（138—139页）

8月9日，吴宓得知中文系批判“右派分子”曹慕樊、赵德勋等阴谋拥戴他和另一教师为系主任，而该系主任和校领导均相信吴宓等并未参与阴谋，望他们勿存顾虑，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宓按此计划之虚实殊不可知，然即樊、勋等确谋推倒魏君之系主任，亦只对一人之攻击，求一职之更调，而乃以反党叛国之罪加之，不亦过乎？”（147—148页）

9月6日，历史系主任转告吴宓，中文系主任请他代“右派分子”曹慕樊讲中文系三年级必修之外国文学课，“宓答以愿代授一年或半年，但请准（1）以樊任辅导（2）宓不编撰讲义，可将樊上年讲义或《世界文学小史》印发学生。（3）宓不全遵教育部定之教学大纲，而可自由改动，授学生以必要之常识，则宓方可效力。”（165页）

10月17日，一友人送来《文汇报》，请吴宓注意报上郭沫若有关文字改革的谈话，并嘱他小心，

勿再谈对文字改革的意见而致祸，“宓大愤怒，告开桂言，我今真恨□□□已极，惟祀苏联速败灭。盖彼之所为，直求亡我中国灭我文化，而其所取之人，所命之工作，无非为其党斗争，以剪灭异己之人，号为民主，实专制之极；外示和柔，实残酷之极。呜呼，吾惟祈速死而已！”（193页）

11月11日，吴宓针对一同事指责“鼓舞鸣放，不嫌劳民，亦今之治术也”在日记中写下感想云：“宓按，既以反右斗争摧残、压抑、遏止有力与多智之意见矣，乃复盛倡一般群众之鸣放而重视之，盖知其中无物，故不嫌其鄙琐，借以收‘民主’之名耳。实则党治=Oligarchy（引者注：寡头政治，寡头统治），非另一新类也。”（203页）

1958年1月7日下午，院务委员会讨论下放问题，会上提出下放教职员分为三类：（甲）轮流锻炼；（乙）下放调职（不必下乡）；（丙）下放（裁员）送农村安置。从北京调来的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孙泱的意见是，“实际各分类研究，但守秘密；公布时（乙）（丙）类不分，统曰‘锻炼’，不告知各人之前途。”（224页）

1958年4月30日晚，吴宓访好友、“右派分子”凌道新，不遇，听凌妻谈校图书馆“右派分子”情形，“如侯文正，其父母既于1933为共党所杀，兄风及弟皆1951镇压死，文正勤恪奉职，而犹以心存仇怨，定为右派分子。呜呼，以猜忌天下人，诛灭异己之心与术，治天下，乌见其能治？此不用中国古圣之仁术，而专效苏联阴残为治者之极弊也。彼专由斯道者，何能长治久安，终亦自害而已。”（278—279页）

从吴宓1958年5月26日日记所记载的他在世界史教研组“向党交心”小组会上发言内容可知，他也对自己作了一定的自我批判，如“鸣放中之心情及言论之错误”，反右前后与右派分子之来往，所亲近的右派“多因均不赞同文字改革”，同时也对一些批判他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如有关指责他把共产党比作“继母”的说法，声明“对中文系事之看法，但未参加樊等之‘阴谋’”。有人批评他：“宓虽有进步，然旧思想、旧感情犹多存。”“宓反右未发言，而曾提原、梓为体制组及学术组委员，此非宓与右派感情之联系乎？应检查。”（308页）

1958年5月28日，在记录系总支书记季平在全系教员会上关于这次思想改造必须彻底，并批判一“右派”教师的讲话后写道：“宓按：今知（1）代表党之人如平者，无论如何皆是正确，皆应服从；（2）有议及文字改革者=反党、反革命。呜呼，知所趋，知所戒矣！”（311页）

1958年5月29日，记录季平在全系会上批判一教师的“错误言论”后写道：“按：宓赞同军之错误意见，其批判者皆出勉强——凡无理可讲者，皆委之于‘阶级本质’，则杀之不为过也！”（312页）

1958年5月30日，吴宓记录一教师交待自己在鸣放及反右中的“错误思想”（“党对群不好”，“党指使团员时而攻击，又时而敬礼老教师”，“党喜服从、恭顺之人”等）后，写道：“宓皆赞同”。（313页）

一同事的夫人因忧其夫被批判能否过关而夙疾（胃病）发作住院治疗，吴宓日记中记载：该同事“……亦忙于己事（赴会、发言、撰稿）数日至无暇往视夫人病，此情形殊可怜。中国古圣贤之教曰：‘治狱礼其情，则哀矜而无喜’。又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今夕见驾车诸骡，瘦不成形，所谓‘残酷的阶级斗争’，所谓思想改造，乃至于摧残万类，人畜同毙已耳。”（314页）

1958年6月13日，因系领导要求吴宓在“今后二日内写足大字报500张”（吴宓只写了90张，全系教师中最少），“会散后，章又责劝宓必完成500张之指标，宓牵章臂曰：‘宓惟有投嘉陵江而死，请君陪伴我往可也。’”“晚饭前，宓告豫：宓实欲自杀，投江而死。”（328—329页）

1958年6月11日，“晨得句云‘速死为安伤老马，余生何望比僵蚕’。”（327页）

1958年6月15日，“夕全系会，议决，命众于明晨八时以前尽力赶写（望宓能于明日正午以前赶写至No.200）因史系自定之指标，今已不能完成。呜呼，作茧自苦，何苦来哉！诸人之辛苦奋力，尤以学生为难能，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云。学生张绳于各教研室，史系学生所写之大字报，一律送至本人（教师）之教研室中，挂满墙壁，复高堆地板上。

呜呼，使师生能如此奋力于学术，岂非佳事；今劳苦何益？或曰□□如此办法，只在使民贫、民愚，而士劳忙不暇用思，又中于宣传，厄于命令，遂不思逞，不敢叛而已矣！”（331页）

1958年7月13日世界史教研组会上，大家对吴宓教学、学术思想中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了批评，“将散，众询宓意见”，吴宓回答：“今说几句‘老实话’：宓之学术思想，有能改变者，有终不能且不愿改变者。宓在政治上一切服从，故如铁托问题，宓视苏联为盟国，美国为对敌，则不问其真相如何，亦将视铁托为叛徒而责斥之。然在学术思想上，则宓所不能赞同、所不愿改变者至多：（1）若云‘汝不改变，即不能生存’，则恐宓再作‘最后之考虑’之后，仍有一小部分断不能改变（意云‘虽杀宓，宓亦不屈’，但未明言之）也。（2）若云‘汝不改变，即不能工作’——则谨答曰：宓今教《世界古代史》及《外国文学》，乃至任何功课，均极感困难与痛苦。宓自问只能作一‘高等资料员’或‘专门翻译员’。宓并非自高自大，亦非怙名求利，宓敬求学校领导考虑：降宓薪级，远在贰级以下，薪金百元已足（亲友当不济助）……宓之学术思想虽不能改变，然当沉默自守，决不想到处宣传，乘机鼓动，以阻遏新机，扰乱政策。宓亦知人民教师（实即政治宣传员、训练员）职权、任务之重要，故宁愿辞去，不为人民教师，则虽无功，亦可免罪，譬如降将，求勿典兵，所以避嫌，亦以保身，此宓正式诚恳之请求与希望也。（404页）

1958年7月26日，上午历史系师生大会，党支部书记季平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动员报告》，吴宓日记记录其要点：“史系右派八十一人，已反右成功。”（427页）

1958年8月22日，吴宓日记中记载，一同事（其女为云南大学学生）告诉他，刘文典（叔雅）“解放后在滇备受优待，乃至1957整风运动及教学改革中痛遭打击，心情极为郁愤。某日忽以脑充血遽死。当局初疑其自杀，侦察后知其非是，方为治丧，登《云南日报》，并在云南大学由中文系开会追悼。该系学生嫌恶叔雅，不肯莅会，经当局严命，始勉强到会云。”他感慨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他联想到反右中死去的李源澄（西南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刘文典等友人，感叹道：“宓岂特免死狐悲而已哉！若碧柳之早歿，得正命而终，比王静安先生为尤幸已。”（464页）“碧柳”指吴宓的好友、诗人吴芳吉，早已于1932年病逝。

在吴宓这一册日记中，还留下了两首以“反右”为主题的诗，一首写于7月13日日记中，“晨作《鸣放及反击右派运动》诗一首。”（129页）

暑热煎蒸列会忙，五光十色好文章。  
飞蛾恋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觉梦香。  
鹰眼鸠身终异类，猿啼虎啸未同方。  
申屠处默嗣宗醉，湔袂余生着意藏。

此诗中“申屠处默嗣宗醉”一句的用典，“申屠”似可二解，一指元朝的申屠致远，“清修苦节，耻事权贵，聚书万卷，名曰墨庄。”二指东汉的申屠蟠，“郡守召为主簿，不就。隐居治学”。嗣宗即阮籍，魏晋著名文士，为避祸而遁于醉乡。

另一首诗写于7月16日，“未晓起，作《记学习所得》诗一首，再寝。”（131页）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这样的诗，与日记中的那些指斥“反右派”运动的言论，如果当时即公之于世，吴宓头上恐怕就不止会被扣上“右派”这一顶帽子了。

应该提到的记者张天授

吴宓未被打成“右派分子”，当然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谨慎，还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应该是《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使他避免了在报上发表一些“鸣放”言论。

1957年4月21日：“晚饭后……8：00《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来，强宓谈（1）学习毛主席内部矛盾演辞之感想。（2）反对汉字拼音及简字之理由。（3）《学衡》之内容及宗旨。（4）《吴芳吉诗集》编辑情形，等。宓久谈，甚倦且苦，且（2）题令宓十分痛愤激昂，大损宓之精神及健康。至10：30授始去，宓寝已11时过矣。”（64页）

4月24日：“晚饭后，张天授来，出示其为《重庆日报》所撰稿，系撮记宓四月二十日晚之谈话。宓再三恳阻勿登。允他日另撰文供给，卒扣留其稿（副本），授允电报馆勿刊登此件而去。”（66页）

5月4日：“上午撰《毛主席讲话对我之启示》一文，应《重庆日报》四月三十日来函征求，11：00文成，约1400字，即至教务处，拟求敬代为审政，不遇，乃至和平村十二舍楼下，访刘又辛，求其审定，辛主张删去中间举例之一段，又修改词句数处，宓悉从之。”“回舍，午饭后，作函致张天授，连同宓所撰文（今余900字），邮寄重庆解放西路88《重庆日报》政教组收。”（73页）

5月20日：“接张天授剪寄（1）1957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2）1957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专电《首都学术界激烈争论‘汉字要不要改革’记》即复函申谢。宓读此剪报，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88—89页）

7月25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如约来，宓综答其所问，谈话录粘存。张天授君对宓约定：（1）以上皆不发表；（2）即采用，亦只选取宓之‘正面’议论；（3）在《报》中刊出之稿，必先寄宓审阅过。”（137页）

张天授的这三点约定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信守职业道德，没有食言（这样讲诚信的记者如今不多见了）。这就使得吴宓的一些很可能被上纲为“右派言论”的话没有在报上发表。如果那些文字发表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使某些领导有心保护他，到那时也很可能爱莫能助了。

然而，张天授保护了吴宓，自己却没有逃脱劫难。吴宓日记8月16日记载，“近日续出之右派分子益多……本市有《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152页）

张天授，1916年11月生，重庆人。大学文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因对报社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后得到甄别。1957年整风鸣放中对“肃反”蒙冤一事提出意见，又被以“翻肃反的案”罪名打成“右派分子”。下放重庆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被打成右派时他本已准备结婚（恋爱对象是一护士），女友坚决不与他分手，但遭到亲属的激烈反对，最后不得不洒泪与他“划清界限”。张天授从此长期独身，待到“改正”时已年愈花甲，虽曾一度与一同属“右派”的女士结婚，但因长年单身生活形成的许多积习难改，婚后性格不合，最终分手。张天授无子女，曾对友人公开说：“是毛泽东让我绝后。”2006年5月90高龄时病逝。

### “检讨错误”和参与“反右”

吴宓不是圣人。生活在现实中，面临强大的政治高压，他不能不感到极端的恐惧。当时西南师院副教务长李源澄被打成“右派”后因含冤负屈致疯，自述与李源澄“交久谊深”的吴宓也不敢表示关心，他在日记中自责道：“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勇为，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184页）

在这样“衰老畏怯”、“生如死者”的精神状态下，吴宓不得不被迫作出一些妥协，十分艰难地“检讨错误”和批判“右派分子”。

1957年7月6日，“上午……大礼堂赴全校学生批判右派分子化三学生曾清泾遂宁人（引者注：‘遂宁人’三字原为小号字）大会，……中间休息时，学生所办《快报》记者，叩询宓与吕烈卿之意见，宓说三条，遂据以刊登，当场印发。又将宓稿编成四条，且为修饰字句，使成强健有力。临散会

时，由主席马娴华当众宣读焉。”（125页）

7月8日上午：历史系分组座谈会“反击右派”：“宓以第三人发言。”（126页）吴宓日记中未记这次发言内容，但在后面的日记中提到了——7月16日，“晚《群众报》记者（学生）男二女一来，征求宓对右派分子光、原、梓之意见。宓不能却，乃述宓在七月八日史系小组会中之所谈，即对光、原、梓发出之质问三条，彼等笔录而去。临去时告宓曰，所录并不刊布。此来目的，乃遍访全院之老少教师，一一得知其态度，俾右派分子成为孤立耳，云云。其后七月十八日上午，在大会中散发之《群众报》33期（并登大字报）所登出者，只宓与光、原绝交之一语而已。”（132页）这里提到的“光、原、梓”即已被打成“右派”的董时光、陈东原、罗容梓。

7月9日，下午参加历史系党支部特约部分老教师召开的座谈会，“今日之会，为研究如何对马益批判、斗争，使益屈服招认。宓发言：益愤世嫉俗如此之深，其感情其心理如何造成，是何原因，益应坦白直陈，则一切可以了解，益亦可蒙矜恕矣（以上之意，应婉达与益）。再则，益应用日记体，详述其所知、所参加之修史馆之一切人物事实，则益之功罪自明。”（127页）

在后面7月24日的日记中还有则吴宓参与批判马益的记载：上午历史系分两组召开反击右派会，甲组批马益，乙组批胡之明。吴宓参加甲组批判，“今日酷热，宓神志不清，缺乏控制，致在会中可以不言而喻，且大失言。不但未正面责评益，处处语病，全违马列主义，显出自己思想之落后、观点之模糊，如云宓痛恨刻薄讥讽之言，何益之深喜鲁迅一派之文章，云云。又责益不早读李康《运命论》，凡此皆宓极力自暴其缺失，自贬其德望，而授谗人以中伤残害宓之口实。会终大痛悔，以此终日郁苦不乐，甚至自祈速死，俾无忧生之嗟，且免见中国德教学术文化尤其汉字之破灭无余也。”（137页）

在批判“右派分子”马益的会上发言，吴宓居然声称自己痛恨刻薄讥讽之言，指责马益为什么要“深喜鲁迅一派之文章”。暴露出他依然站在当年攻击鲁迅的立场上未有改变，“自暴其缺失，自贬其德望，而授谗人以中伤残害宓之口实”。读到此处，不禁要为吴宓的天真坦诚而苦笑。

吴宓在1958年5月13日日记中记载：下午历史系开会宣布对右派的处理：其中“益撤职，留用察看，工资7→11级（为Ⅲ类），下放农村，后日离校。”（287页）

据《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中有关马益的注释介绍：马益（1913—1959），四川三台人。成都师范肄业。1952年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兼资料组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离校赴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7月在田间劳动中暑而死。（第一册513页）

对马益之死，在吴宓日记中也有记载。1959年7月18日，吴宓在一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家访谈时，得知：“前数日马益史学系右派分子（引者注：‘史学系右派分子’7字原为小号字）在田间中暑，舁送九医院，未至而死。”（第四册130—131页）

吴宓日记中对马益之死未置一评，但在其后7月23日日记中记有一段文字：“遇琴，命介绍书店（引者注：指吴宓常有联系的重庆古旧书店）来购马益遗书，而毫无关切之意。甚矣，今人之无感情，又安得使群众有爱党爱领袖之热烈感情哉？”（第四册133页）

除了参与批判马益外，吴宓还参与了对其他“右派分子”的批判。1957年7月23日，市委宣传部派人来，“询宓对鸣放及反右派之意见，及党群关系，知识分子今昔待遇等之看法。宓乃具述说宓在《院刊》中所布及在大会、小组座谈中所言者，以表明宓对党、政府及学校之真态度，及宓对澄及光、梓、原等之关系与批评，力示宓坦白无隐，不夸不饰。”（135页）日记中提到的“澄及光、梓、原”，是当时西师的几个正受到大批判的“大右派”李源澄（副教务长、民盟西师负责人）、董时光、罗容梓、陈东原。

在同日后面的日记中，吴宓才对西南师院的“反右派”运动写出了他的“真态度”：“呜呼，鸣放之在西南师院，只为……（引者注：此处他分别写出了教育系、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各系主任及他们所整之人的姓名或姓名中一字）主任之藉端报复，消灭异己者而已。至受祸之诸人，则或缘名利

心重，欲为系主任……或本才学优长，平日苦受压抑……而其人性行亦有缺点，过刚，而不善自藏。（引者注：“过刚……”一句原为小号字）遂遭忌受谗，而罹于祸。以上只举文科四系，其他教职员多类此。（引者注：“以上……”一句原为小号字）凡宓所记，皆信史之应秘传者也。”136页）

他在日记中将陈东原归于“名利心重，欲为系主任”，罗容梓归于“才学优长，平日苦受压抑”，可见他虽然同情这些被打成“右派”的同事，但对他们也有所讥评。

1958年3月22日，“上下午历史系处理右派分子学习……上午学习会中，宓简言，对新有温情主义，今决与新划清界限，随同人对新斗争，并改造、挽救之，云云。”这里提到的“新”即吴宓的好友凌道新。“晚饭后，7—8 豫邀同游步操场，谈新事，又询宓思想态度，宓均以实答。豫谓今之社会主义改造事极严厉，宓欲求自保，积极比消极态度实更好云云。……读《亭林诗集》至中宵，流泪甚多。”（252页）

1958年3月25日上午，历史系在大礼堂召开反右联合斗争大会，有人劝吴宓写书面发言，“宓未应，辞以倦将病。按昨晚甫在会中撰就联合发言稿，宓已从命签名，今日登《海燕报》，在会场散发矣。”“晚史系处理右派分子学习……分组判定，宓为新说解，记录粘存。”（第四册 254页）

1958年5月31日，吴宓在全系会上发言中说：“宓 1957 五月三十一日鸣放发言，近由检得旧稿，又由对阶级立场、阶级斗争之新认识，思想提高，始知宓发言关于本院之体制之建议，实将削弱或部分取消党之领导，即=反党。由此奉劝豫更检查其鸣放中之思想。”（315页）

吴宓在这里将自己关于学院教学体制的建议发言上纲到了“反党”的高度。

### 领导无意整吴宓

众所周知，在“反右”中挨整，与本单位领导关系极大。如果领导要想整谁，即便是一言不发，也可以被“戴上帽子”的。吴宓未被打成“右派”，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南师院的领导并未打算将他划入“右派”行列整下去，因而对他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这在其日记中多有记载。

1957年4月20日下午：“在大礼堂全校聚聆张永青院长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讲《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之办法》。”4月22日：“下午……4：00 赴史系，途遇党委宣传部某同志，传张院长命，促宓撰文，述宓二十日聆毛主席讲话后之感想，备登《学习周报》第一期云云。宓辞以（1）病（2）未聆全文（3）个人意见未及在小组讨论切磋，恐多失误，请稍缓撰文，登《学习周报》第二期云云。”（64—65页）

4月23日吴宓撰写文稿，24日“上午修成昨撰之文，9：30 至教务处见敬面交，求敬删正后代呈张院长。”（65页）这里提到的“敬”即教务长方敬，是中共老党员、诗人。吴宓后来的日记中对方敬有这样的评价：“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第七册 502页）

4月29日：“上午9：00 谒方敬教务长，商改宓四月二十三日为《院刊》所撰文，改题为《知识分子之安排与使用》，删去篇首自叙1949→1952→1955→1957 心情变异之一大段，余仍旧。敬对宓甚关切，如此删改，实较妥善也。”（70页）

6月20日，“下午……赴第三十四次院务委员会议，姚院长主席，引宓同座。”（114页）

7月22日上午历史系全系大会批判系办公室试用职员胡之明右派言行，“会散后，途中，季平先询宓连日开会倦否，继云‘以后先生对史系事，有任何意见，可随时告平’。”（134页）季平是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在批判“右派”之时对吴宓表示这样的特别关心，显然表明了领导不想整吴宓的态度。

1958年3月29日，“连日大跃进中之大字报，对宓责难过甚，静观世变，消灭旧知识分子之政策正在厉行，宓等虽蒙优待，亦坐待其死灭而已。于是宓近日顿成消极，不但欲早退休，以图免罪免祸，且有望早死之心，惟祈正命而死，不遭横祸，斯为幸已！”（256页）

当晚吴宓去找到教务长方敬，“细述近情”，请求方敬与他同讲《外国文学》课，“大抵以宓之材



料知识与敬之观点批判，合而为一，相辅共济。”方敬表示吴宓的意见“似可”，但他校务工作太忙，无法办到。“又敬云，学校当局对宓极明悉，亦尊重，学生之责难不足忧，但恐宓授课太多，精力不胜。”对吴宓作了一番安抚工作。“宓归途自思，一切仍宜冷静沉着应付，不可烦郁急躁，致自招祸患也。”（257页）

1958年4月5日历史系召开了“右派分子”宣判大会。次日上午张永青院长便到吴宓住处探望，“张永青院长莅止。先是四月四日下午，聆张院长讲毕，在厅外宓便言，拟谒张院长于办公室，祈于暇时召见，承答‘我当于空时趋访’云云。宓方疑此系礼贤下士，抑托故拒见之意；今张院长竟莅止，宓方知误疑。于是陈明前者请求转系之理由……”张院长在谈话中安慰他：“至学校对一教师之观评，乃看全面，决不纯视学生提出之意见也，云云。”吴宓提出自己作一“高等资料员”或“技术翻译员”为最适宜而最愉快。“张院长殷切询问宓生活各事，健康情况，”（266页）

另一件事也可以看出西师领导对吴宓的态度。1958年5月，西师在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同时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时候，吴宓“向党交心”的发言得到领导好评，并被评为“全院工会第一名”，贴喜报表扬（287页）。5月22日，却有七个历史系学生贴出大字报质问吴宓：（一）何故“怕党”？（二）鸣放中有何错误言论？（三）与右派分子之关系如何？并要求即速答复。吴宓赶在教研组开会前写出“甲号大字报，简复如下：（一）宓只说‘一般人怕继母’，未说过‘宓怕党’；（二）宓自觉鸣放中之言论‘无错误’；（三）‘除凌道新外，由反右之时期起，宓与右派分子无往来’云云。”（298页）

开会不久，党总支书记季平“招宓至党支办公室久谈（约近二小时），平谓学生等对宓甲号大字报关门之态度大为不满，应知宓之思想问题亦极严重，（二）（三）两项必须详细认真交代检查（并批判），如宓所作诗甚多，已由各方面缴获，今诵一句‘层层制度莫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云云，以概其余，宓断不能隐讳。须知党对宓甚尊重而爱护备至，平今日亦已再三考虑斟酌，乃决定对宓说明，此非政治问题，乃是思想改造，宓必须完全交心，乃能跟随党走；交出后，对宓并无危害，亦不改变对宓之待遇。如宓不愿交代，今亦决不勉强云云。”（209页）

如此宽厚得近于“呵护”的态度，显然是一般被打成“右派”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

吴宓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1957之劫。

（原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0期，发表时有删节，题目改为“1957年中的吴宓”。）■

## 旧报重读：1957年重庆整风反右片断（二则）

### 重庆市已在民盟内部揪出130多个右派分子

#### 重庆日报

**本报讯** 随着全市各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步步深入，民盟重庆市组织内的右派分子正在一个一个地被揪出来。据最近的初步统计，已揭发出盟员右派分子130余人，约占全市盟员总数的15.6%。

从现在已经揭发出的情况看，民盟重庆市委的23个委员、候补委员中就有12个右派分子，12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9个是右派分子。在民盟右派黑帮中挂帅的是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市委委员、组织部长舒军，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民盟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康，民盟市委委员胡克林，民盟市委委员冯克熙，民盟市委候补委员、秘书处主任杨复全。从去年以来，他们就依照民盟右派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及民盟四川右派头子潘大逵的秘密指示，勾结一起，篡夺了民盟重庆市委的实际领导权，积极策划反共阴谋活动；并且把章罗联盟的反动指示，发展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十大纲领”（又称“十点指示”），布置贯彻到基层组织。他们又在5月21日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向基层

组织发出点火指示。在这个煽动性的指示下，盟员右派分子就肆无忌惮地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

从去年8月起，舒军、李康、杨复全就按照章罗联盟的指示，在重庆大肆招兵买马。他们一方面不顾民主党派的分工和协商，一方面又不讲条件、不择手段地到处拉人入盟；舒军还提出“一天发展一个”、“打一个滚”等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们要把民盟搞成为一个与共产党对抗的政党，特别致力于搜罗政治历史有问题、一贯对党不满的分子入盟。从去年8月到年底就发展了137人，今年1月到5月又吸收了180人。在这10个月当中，新发展的人数就超过原有盟员一半以上。尤其是在5月份鸣放期间，更是放手大发展，有所谓“火线入盟”的，一个月就搜罗了83人。臭名昭著的文艺界右派分子刘盛亚、汪子美以及教育界右派分子陈东原等，都是在“大发展”当中入盟的。

在本市的9所高等学校里，民盟的9个基层组织已有7个为右派分子所把持。据初步统计，在高等学校中已揭发出民盟右派分子48人，其中右派骨干分子就有23人。如西南师范学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李源澄，西南农学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叶谦吉、副主任委员蒋书楠、委员刘佩瑛，西南政法学院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朱驭欧，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民盟支部主任委员龚灿光、委员刘稚苓，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民盟小组长范道棻等，都是右派骨干分子。他们在鸣放期间猖獗一时，利用民盟基层组织大肆煽风点火，有的亲自出马打先锋，有的在幕后指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他们竭力攻击高等学校的党委制，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攻击人事制度，污蔑农业合作化的成就，叫嚣党不能领导学校，提出“教授治校”“民主党派联合治校”等旨在篡夺党的领导权的荒谬方案，他们还恶毒地煽动三反、肃反中被审查过的人出来翻案。

中等学校里也已揭发出一批盟员中的右派分子：普通中学就有32人，中等专业学校有19人。第22中学校长宋乐颜、重庆城市建设工程学校副校长姚江屏，都是民盟重庆市委秘书处副主任。这两个右派分子都是民盟重庆右派集团的干将。在中等学校里，还揭发出了几个由盟员领导或组成的右派集团。第20中学有一个以盟员唐永槐为首的右派集团，纠合一些非盟员教师向党进攻；重庆农业学校的4个盟员组成了右派集团；重庆师范学校、重庆银行学校也揭发出了由盟员右派分子组成的反共小集团。

民盟小教支部也掌握在右派分子手中，他们在小学校里干了许多罪恶活动。除了在小学里招兵买马之外，这个民盟小教支部还在鸣放期间蓄意打乱党和行政的整风部署，分别召开“盟群座谈会”多次，煽动“群众”“吐苦水”，对党进行污蔑和攻击。

民盟右派集团不仅在大、中、小学里猖獗活动，并且还把他们的魔爪伸入到文艺界，阴谋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利用这个重要的思想阵地进行放毒。右派分子刘盛亚、汪子美充当了民盟右派在文艺界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刘盛亚去年入盟后，即与舒军、李康串通一气，针对文艺界党的领导进攻，叫嚣文艺界“应该让真正懂文艺的人来领导”。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使刘盛亚在重庆文艺界挂帅，又恶毒地要为这个右派分子的黑色反动小说“再生记”翻案。美术界的右派分子汪子美入盟后，更加放肆地组织反共的“辛社”小集团，到处安插据点，厉兵秣马，准备把“辛社”的几员干将拉入盟内，共同图谋篡夺党对美术事业的领导。民盟右派还将他们的魔爪伸向政府机关，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

这批民盟右派分子，在人员的强有力追击下，已开始土崩瓦解。有些右派分子已开始低头认罪，有些右派分子不老实彻底交代自己的罪恶活动，尚图顽抗；另外还有一些狡猾的右派分子仍在假装正经，企图蒙混过关。因此斗争还必须继续深入，把民盟组织内的右派分子一个一个地都揪出来，直到他们全部缴械投降。

来源：1957年《重庆日报》9月18日。原题为“打断资产阶级右派豺狼的脊骨、本市已在民盟内部揪出130多个右派分子：目前尚有一批右派分子仍在进行顽抗，还有一些隐藏较深的右派分子未挖掘出来，斗争还须继续深入”。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年第一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

## 重庆市在整风中揭露了不少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新华社重庆6日电 重庆市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从去年11月初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如期完成。代表大会预期在1月14日开幕。

这项准备工作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取得反击右派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把主要力量转到内部，对党内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工作。也就是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中心内容，在党内的领导骨干中进行整风。

这项准备工作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召开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第二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重庆市在11月8日到11月底召开了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了全市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除了充分揭露三个主义之外，还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和以他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活动(包括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谢予等人)；揭露了在党内隐藏了二十年的阶级异己分子、重庆水轮机厂厂长丛成和党委书记翟振中、副厂长张凤利等人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揭露了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在工会工作中发展工团主义的市工会主席、市委候补委员张显仪的反党活动；揭露了向党争权、闹独立、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市委委员、副市长陈筹和市委副秘书长田伯萍等人的错误。此外，会议还揭露了其他一些具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向党要名誉，闹地位的同志的错误。

这次会议暴露出党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的不纯是惊人的，反映在党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在参加扩大会议的四百七十四人中，揭露出右派分子或犯严重右倾错误、突出的个人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有二十八人，占到会人数的5.9%。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犯有反党性质错误的有十人，占2.1%；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七人，占1.4%；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九人；占1.9%；违法乱纪的二人；占0.42%。

这次会议对全市整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市委扩大会议，全市各单位党组织从去年12月份开始，采取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形式，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深入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现在全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达到一万多人，揭发出的问题较多。各单位的统计：有严重问题、列为重点、分别在大会小会作为批判对象的人，一般大约占到会人数7%到10%(其中在大会批判的约2%左右)；反党反社会分子一般占到会人数的1.5%—2%。这个比例，反映出党内90%以上的领导骨干，在政治立场上是坚定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最严重、问题较大的人只是少数。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已深入到领导核心的主要的部门，而且突出表现在对待党的领导问题上。

市委宣传部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文澄、王匡时、谢予等的影响，实际上起了很多“裴多菲”俱乐部的作用，成了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地方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不但割断了市委的领导，拒不执行市委的指示，而且把宣传部、报社变成了对市委进攻的阵地。在他们控制下的报社、电台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倒戈向党进攻。市工会实际上成了张显仪的独立王国，不但拒绝党的领导，而且不让党和群众直接联系。在张显仪工团主义的腐蚀下，原有领导骨干大部分已经垮了。从市工会揭露出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来看，都是领导骨干。如：邓平是市工会秘书长，郭平时市工会生产部长，王延平是市建筑工会主席，贾飞龙是省电业工会主席。其中有两人(邓平、郭平)是市工会党组成员。政府系统陈筹、田伯萍等人的向党争权、闹独立性的倾向也是恶劣的。他们强调人委是一个整体，除财权、事权外，还公开向党争人权，争对各局党组的领导权；他们对一些带全市性的问题，不向市委请示报告，企图把人委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厂矿方面也揭露出不少问题。有的以属中央管的大厂领导者自居，对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不尊重。如水轮机厂以丛成为首的反党集团(党委书记、厂长、副厂长都是反党分子)一贯抗拒市委领导，对市委派去的副书记连薪金都不给。他们互相包庇，

在厂内称王作霸，对干部、职工完全采取一些官僚统治的办法。丛戎曾说：“我们这些人(指他们三人)水平不低了，有意见不一定要批评”。对干部呢？丛戎指示：“要抓三个东西：一命令；二制度；三处罚。要先打后拉，打得他服了再拉”。他威胁干部和群众说：“我这个人是不好惹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人敬我一丈，我就送他上天！”丛戎的横暴发展到用惩办主义对待工人，强制实行废品赔偿制度，使厂内40%的工人遭到了扣工资来赔偿的惩罚。金工等车间工人赔偿的面达到70%到83.8%。有一个工人因废品赔偿扣工资得扣二十年之久。不少人弄得饭都吃不起了。职工对他的罪恶，早就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当这次撤销丛戎职务的决定在厂里宣布后，工人欢呼鼓掌，说共产党好，英明，有的感动得流泪。

由于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指示和支持，重庆市委在这场尖锐斗争中表现了很大的决心，首先是不怕烧了自己(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也不怕)；其次是不怕某些部门整垮，始终坚持严肃斗争的原则，坚持有问题必须要解决的态度，并且相信大多数。因此，扩大会议一开头，即专门大鸣大放，针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大家提出了三千多条意见。当着三个主义放透，温度烧高的时候，许多坏的东西就出来了。会议开始时，有的人说：“我们都是老干部，都是‘老奸巨猾’的，想放右派时放不出来的”。后来温度稍高，有人就说：“让我发了言再讨论”及三个主义放到了高潮，有的人就到了情不自禁与肆无忌惮的程度，竟说：“让我把意见说完，当成右派也可以。”会上放出的错误言论、反动言论很不少。

这场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的斗争，目前看来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委坚持了对问题分清内外性质分别对待的原则。对张文澄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采取了和党外一视同仁，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和坚决批判、打垮的方针。但另一方面为了争取中间分子，各书记、常委都亲自和他谈话，再忙也不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使他感到不绝望，因而斗争虽十分尖锐、猛烈，却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属于思想作风错误性质的同志，采取了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方面毫不怜惜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另外积极关怀他们。因此，虽然斗争是尖锐的，但没有伤害这些同志，他们感到这是挽救他们，表示真诚改正错误。由于群众情绪高涨，目前中共重庆市委与提出克服温情主义的同时，也注意了防止乱戴帽子，随便扩大斗争面、不分内外界限等等粗暴的作法。

这次斗争对各单位负责干部的教育十分大，他们参加了市的整风，又参加本单位的整风，上下左右几方面的帮助和揭发批判，压力较大，不但发现了若干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许多党组织内的老问题也在这次彻底解决了。普遍感到，这样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一次清理，同时又开党代表大会通过贯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工作方案和决议，劲头就特别大。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7日。转载自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年第一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 ■